

## 中國古代原生性「正變文學史觀」詮釋模型之重構

顏崑陽

### 摘要

晚清以降，自林傳甲或竇警凡或黃人的第一本《中國文學史》開始，迄今百餘年間，現代化的《中國文學史》著作，累計已千餘種；然而，由於缺乏這門學科的知識本質論、認識論、文學史觀、方法學，故多轉相抄襲，極少合格而質優者。其中，二大主流的「文學史觀」，更是非常偏謬：一為因追求現代化及文界革命，而深受西方生物學與社會學之「進化論」影響，「文學進化史觀」蔚為風潮；二為受教條化之馬列思想與政治意識形態所支配，倡說階級鬥爭的「唯物論文學史觀」成為僵化的框架。

這二種史觀乃舶來移植，與中國古代文學源流全無任何關係。其詮釋有效性，自一九九〇年代興起的「文學史理論」熱潮開始，已備受質疑、批判。然而至今學界仍破而不立，還沒有學者能從中國古代「原生性」的文學史觀，重構系統嚴整的「詮釋模型」，以做為「中國文學史」書寫的理论基礎。

本論文即針對中國古代「原生性」的「正變文學史觀」，經由相關文本的理解、詮釋、分析、綜合，將隱涵、零散的觀念加以揭明、統整；而在「文學史觀」的理論設準下，將它「重構」為二種系統嚴整的「詮釋模型」：一為「因正創變，迭代循環」詮釋模型；二為「歸源宗正，因時創變」詮

---

2021/04/08 收稿，2021/05/25 審查通過，2021/06/02 修訂稿收件。

\* 本論文為科技部 109 年度《中國古代「原生性」文學史理論重構》三年期專書寫作計畫第一年執行成果，計畫編號：MOST 109-2410-H-030-075-MY3。

\*\* 顏崑陽現職為天主教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講座教授。

DOI:10.30407/BDCL.202106\_(35).0002

釋模型。這二種正變史觀的詮釋模型，可資應用於現代《中國文學史》的書寫，以詮釋歷代各類文體的正變演化發展。

關鍵詞：正變文學史觀、進化史觀、唯物史觀、風雅正變、詩體正變

#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pretive Model for the Original Ancient Chinese “Normal and Mutated Perspectives on Literary History”**

Yen Kun-yang

## **Abstract**

Since the emergence of the first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by Lin Chuanjia, Dou Jingfan or Huang Ji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re have been more than one thous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published over the past hundred years or so. However, due to lack of knowledge on essentialism, epistemology, perspectives on literary history and methodology, many of these works plagiarized among one another, resulting in most of them being in poor quality. The two mainstream trends of “perspectives on literary history” among these are especially biased and absurd: one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western bi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evolution” theories in pursuit of modernization and literary revolution, consequently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 literary history” becomes very popular. The other is dominated by dogmatic Marx-Leninism and political ideology, and promotes the rigid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materialistic perspective on literary history.”

These two perspectives are grafted from outside, therefore have no connection with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Their interpretive validity has been questioned and criticized repeatedly since the “literary theory” boom in the 1990s. However, so far, the academic world only manages to deconstruct without being able to reconstruct. A systematic and rigorous “interpretive model”

---

\* Chair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for original ancient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literary history has yet to be established to form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writing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This paper, therefore, focuses on the original ancient Chinese “normal and mutated perspectives on literary history.” Through understanding, interpreting, analyzing, assembling relevant texts, it reveals and reorganizes hidden, scattered ideas, so as to “reconstruct” them into two systematic and rigorous “interpretive models” as standards for theories on “literary history.” They are “circular movements from the normal to the mutated and back” and “changing with time and returning to the origin.” These two interpretive models about the normal and the mutated perspectives on literary history can guide the writing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and also explai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normal to the mutated and back for various genres over the ages.

Keywords: Normal and Mutated Perspectives on Literary History,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 Literary History, Materialistic Perspective on Literary History, Normal and Mutated Airs and the Odes, Normal and Mutated Poetic Genres

## 一、問題從反思批判近現代百年來《中國文學史》書寫導出

「中國文學史」做為一門特定的學科，以及因應此一學科的設立，而撰述名為《中國文學史》的專書著作，始於晚清光緒年間；它與清廷因國際時勢所迫，諸多有識之士發起追求現代化，創建京師大學堂而「文學立科」同步開展，<sup>1</sup>至今已逾百年。這百年以降，各大學中文系都以「中國文學史」為最重要的必修科目之一，而這類著作也已出版千種以上。此一百年學科，究竟存在多少問題？必須反思批判，才能建構一門確當合格的文學知識。其中，最為根本的問題是，挪借西學而已普行數十年的「文學史觀」適合用以詮釋中國古代文學史嗎？假如不挪借西方的「文學史觀」，則中國古代文化及文學傳統內部，涵有「原生性」的文學史觀，可以進行「重構」其觀念系統，而藉以應用到《中國文學史》的書寫嗎？

那麼第一本《中國文學史》之作，何時出現？作者是誰？雖有些爭議，但時間相差無幾，這種爭議沒有太大意義。大致而言，光緒 23 年（1897），寶警凡編撰完成《歷朝文學史》，稍後於光緒 32 年（1906）正式出版。<sup>2</sup>光緒 30 年（1904），林傳甲於京師大學堂編撰完成《中國文學史》的講義，稍後於宣統 2 年（1910）正式出版。<sup>3</sup>黃人於光緒 31 年（1905）左右編撰出版 30 冊巨著之《中國文學史》。<sup>4</sup>就在這一時期，一種系統性、章節體的現代化《中國文學史》書寫於焉誕生。其後，繼之者迭出，到一九九〇年代，此一領域相關的專書著作，其數量究竟有多少？根據陳玉堂《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的蒐集、統計，<sup>5</sup>截至 1949 年止，約有 346 種。而吉平平與黃曉靜合編《中國文學史著版本概覽》，<sup>6</sup>接續陳玉堂之後蒐集、統計，從 1949 年到 1991 年，單是大陸地區便有 580 種左右。至於黃文吉《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的統計，<sup>7</sup>截至 1994 年止，約有 1606 種。從 1994 年到現在 2021 年，

<sup>1</sup> 晚清創建京師大學堂而「文學立科」，參見陳國球：《文學史的書寫型態與文化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

<sup>2</sup> 〔清〕寶警凡：《歷朝文學史》（線裝鉛印本，1906 年）。

<sup>3</sup> 林傳甲於京師大學堂編撰「中國文學史」講義，原署名林歸雲。其後正式出版林傳甲：《中國文學史》（杭州：武林謀新室，1910 年；臺北：學海出版社，1986 年）。

<sup>4</sup> 黃人：《中國文學史》（上海：國學扶輪社，約 1905 年）。

<sup>5</sup> 陳玉堂：《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合肥：黃山書社，1986 年）。

<sup>6</sup> 吉平平、黃曉靜合編：《中國文學史著版本概覽》（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6 年）。

<sup>7</sup> 黃文吉：《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臺北：萬卷樓圖書，1996 年）。

這 25 年間，雖還沒有新編的書目出版。不過，相信又有數量可觀的著作問世；然而，「中國文學史」這門學科的知識本質論、文學史觀、方法學既未聞有何改變，則這類著作的知識形態也就不可能產生脫胎換骨的轉型。那麼，數量這麼龐大的「中國文學史」著作，其品質究竟如何？我們若僅就最根本的「文學史觀」加以檢討，就可簡要的指出下列問題：

### （一）缺乏史觀的《中國文學史》書寫

自竇警凡、林傳甲、黃人之後，一九一〇年代，開始多量出現這一類邁向現代的《中國文學史》，例如王夢曾、王國維、曾毅、張之純、朱希祖、謝无量等人的著作。<sup>8</sup>這一時期，只有黃人的《中國文學史》提出借自西方的「螺旋型進化史觀」。「螺旋型史觀」也是「循環論史觀」的一種；「循環論史觀」曾經流行於古希臘、羅馬，認為歷史的運動如同自然界的運動，始終處在不斷的循環之中；無數次的循環，其歷程都是一樣；總是在大破壞、災難中，一切文明的成果完全毀滅，下一次循環又從零開始，形成週期性的往復。及至 20 世紀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西方的沒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一書，<sup>9</sup>以自然界春夏秋冬做為文化循環模式的象徵，則與傳統無數次週期性循環有所不同。他採取的詮釋模式是中國、印度、埃及、希臘、羅馬、阿拉伯等，每種文化型態都只有一次循環。「螺旋型史觀」雖然是「循環論史觀」的一種，但卻有些差別，它不把循環看作封閉的圓圈型，而看作半開放的螺旋型，在循環中上升。這種史觀，也是起於希臘、羅馬時代；至 18 世紀，義大利哲學家維科（Giambattista Vico, 1668-1744）《新科學》（*Scienza Nuova*），<sup>10</sup>所論最具有影響力。螺旋型只有描述歷史運動規律之義，不含價值判斷。而同為螺旋型，又有「前

<sup>8</sup> 王夢曾：《中國文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14 年）。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15 年；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4 年），多家出版社翻印流傳甚廣。曾毅：《中國文學史》（上海：泰東圖書局，1915 年；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7 年）。張之純：《中國文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15 年）。朱希祖：《中國文學史要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部，1916 年）。謝无量：《中國大文學史》（上海：中華書局，1918 年；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7 年）；又謝无量：《中國婦女文學史》（上海：中華書局，1916 年；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3 年）。

<sup>9</sup> [德]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著，陳曉林譯：《西方的沒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 年）。

<sup>10</sup> [義]維科（Giambattista Vico）著，朱光潛譯：《新科學》（*Scienza Nuova*）（臺北：駱駝出版社，1987 年）。

進」與「倒退」之別，這就含有不同的價值判斷了。<sup>11</sup>「螺旋型進化史觀」，就是結合「螺旋」與「進化」二個概念，含有正向的價值。

黃人應該是受到西方這種史觀的影響，在所著《中國文學史》中認為文治之進化非直線型，而為不規則之螺旋型；一線之進行遇有阻力，或退而下移，或折而旁出，或仍循原軌；故歷史之所演，有似前往者，有似後卻者，又中止者，又循環者，即細審之，其範圍必擴大一層，其為進化一也。這一時期，除了黃人的著作之外，其他《中國文學史》大抵都是文獻的編排、鋪陳，並無自覺、特定的文學史觀。這種現象，至 1922 年間，鄭振鐸〈整理中國文學的提議〉一文中，便嚴加批判，認為諸作少有合格者。<sup>12</sup>

## (二)「文學進化史觀」滲透性的泛影響

一九二〇到一九四〇年代，隨著新文化運動與白話文學革命的開展，《中國文學史》書寫更掀起熱潮，通代、斷代、分體俱出，僅大陸學界，產品就超過 100 種。<sup>13</sup>比較通行的是劉師培、魯迅、胡懷琛、胡毓寰、譚正璧、趙景深、梁乙真、胡適、胡小石、王易、羅根澤、胡雲翼、陸侃如、馮沅君、鄭振鐸、劉麟生、盧冀野、龍沐勛、阿英、陳柱、周貽白、劉大杰、蕭滌非、林庚等，皆有著述。<sup>14</sup>並且不少作者已明顯自覺的提出特定的文學史觀。

<sup>11</sup> 上述有關「循環論史觀」、「螺旋型史觀」，參見嚴建強、王淵明：《西方歷史哲學》（臺北：慧明文化，2001年），頁 57-66。

<sup>12</sup> 鄭振鐸：〈整理中國文學的提議〉，《文學旬刊》第 51 期（1922 年 10 月），頁 1-3。

<sup>13</sup> 黃文吉：《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頁 347-371、430-432、450、453-455、461-463、467-469、488-491、502-503。

<sup>14</sup> 劉師培：《中古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部，1920 年；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 年），另多家出版社翻印。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上、下卷（北京：新潮社，1923、1924 年；臺北：明倫出版社，1969 年），另多家出版社翻印。胡懷琛：《中國文學史略》（上海：梁溪圖書館，1924 年；臺北：廣文書局，1980 年）。胡毓寰：《中國文學源流》（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 年；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年）。趙景深：《中國文學史小史》（上海：光華書局，1926 年；臺北：啟明書局，1958 年），另多家出版社翻印。梁乙真：《清代婦女文學史》（上海：中華書局，1927 年；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58 年）；又梁乙真：《中國婦女文學史綱》（上海：開明書店，1932 年）。胡適：《白話文學史（上）》（上海：新月書店，1928 年；臺北：啟明書局，1957 年），另多家出版社翻印。譚正璧：《中國文學進化史》（上海：光明書局，1929 年）。胡小石：《中國文學史》（上海：人文社，1930 年）。王易：《詞曲史》（上海：神州國光社，1931 年；臺北：廣文書局，1960 年）。

晚清以降，中國新知識分子追求現代化，展開「自強運動」，因此開始引進西方思想，大量譯介西書。甲午戰後，1895年間，嚴復在天津《直報》發表系列文章，〈論世變之亟〉倡說斯賓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的「社會進化論」；〈原強〉則介述達爾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的《物種起源》，倡說「生物進化論」；<sup>15</sup>另又譯介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天演論》、<sup>16</sup>斯賓塞《群學肄言》。<sup>17</sup>前者一部分是英國生物學家、哲學家赫胥黎在牛津大學的講稿，另一部分則是赫胥黎《進化論與倫理學》的〈導言〉。嚴復將二者合譯，取名《天演論》。赫胥黎受達爾文「生物進化論」與斯賓塞「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將這種思想引入「倫理學」去討論，其實他頗批判、反對以「進化」的觀念去處理人類社會的互動及發展問題；但是，嚴復在當時追求現代化的歷史情境中，

---

羅振澤：《樂府文學史》（北京：文化學社，1931年；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胡雲翼：《增訂本中國文學史》（上海：教育書店，1931年；臺北：第一文化社，1956年；臺北：三民書局，1979年），另多家出版社翻印。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上海：大江書鋪，1931年；臺北：明倫出版社，1969年），另多家出版社翻印；又陸侃如、馮沅君：《中國文學史簡編》（上海：大江書鋪，1932年；臺北：開明書店，1957年），另多家出版社翻印。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北京：樸社，1932年）；鄭振鐸：《中國文學史》（臺北：明倫出版社，1969年），另有多家出版社翻印；又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8年；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劉麟生：《中國文學史》（上海：世界書局，1932年；臺北：中新書局，1977年）；又劉麟生：《中國駢文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盧冀野：《明清戲曲史》（南京：鍾山書局，1933年；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年）。龍沐勛：《中國韻文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臺北：樂天出版社，1970年）。阿英：《晚清小說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臺北：天宇出版社，1988年），另多家出版社翻印。陳柱：《中國散文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周貽白：《中國戲劇史》（北京：中華書局，1940年）。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上、下冊（上海：中華書局，1941、1949年）；劉大杰：《中國文學發達史》（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56年），另有多家出版社翻印。蕭滌非：《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重慶：中國文化服務社，1944年；臺北：長安出版社，1976年）。林庚：《中國文學史》（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47年；臺北：廣文書局，1963年）。上列此一時期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文學史著作，悉見黃文吉：《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

<sup>15</sup> 嚴復：〈論世變之亟〉、〈原強〉，收於嚴復著，王棊主編：《嚴復集》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1-5、5-15。

<sup>16</sup> [英]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著，嚴復譯：《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湖北沔陽盧氏慎始齋木刻本，1898年；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

<sup>17</sup> [英]斯賓塞（Herbert Spencer）著，嚴復譯：《群學肄言》（*The Study of Sociology*）（上海：文明書局，1903年；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年）。

卻斷章取義，只取其「進化」(progression)一義而已。後者是斯賓塞出版於1872年的《社會學研究》，乃其《社會學原理》一書的前導之作。他將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應用於社會學，而認為「進化」的法則不但適用於自然界的「物競天擇」，也適用於人類社會，可拿來解釋人類社會的競爭與發展。

這類西書的譯介、傳播，正切合當時知識分子追求現代化的歷史情境，很快就蔚為思潮；於是自然界各物種為適應環境、生存競爭而產生非出於意志之形構及功能的演化(evolution)，這樣的自然法則被應用到文化社會處境中，以解釋出於人類之意志，因為彼此競爭而用心追求的「進化」(progression)。同時，「演化」一詞也由不含價值判斷描述義轉用含有評價義的「進化」一詞，表示越來越好的「進步」之意。這種「進化論」影響所及，又適逢反傳統、追求科學的新文化運動、白話文學革命，「文學進化史觀」便一時蔚為風潮。自一九二〇年代到一九四〇年代，幾乎大部分的《中國文學史》著作都秉持這一從西方移植的「進化史觀」，甚至譚正璧更直接以「進化」為自己的著作命名曰《中國文學進化史》。<sup>18</sup>其中，不少著作除了高舉「進化論」的旗幟之外，更湊合了中國傳統「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以及上述西方19世紀末以來普遍流行的「有機循環史觀」，<sup>19</sup>再加上胡適所倡導「平民／白話／活文學」與「貴族／文言／死文學」二元對立的觀念，就形成這一時期《中國文學史》書寫普遍流行的史觀，甚至成為一種固著的「文化意識形態」。

早期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的論述，已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之說。<sup>20</sup>其後胡小石、魯迅、胡適、鄭振鐸、傅斯年等撰寫文學史，也提出這個說法。這是元明清戲曲、小說論述常見的觀點，而被這些學者引入文學史的書寫。<sup>21</sup>這種觀念，在整體社會文化追求現代化之進步的情境中；在新

<sup>18</sup> 譚正璧：《中國文學進化史》。

<sup>19</sup>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即挪借史賓格勒的「有機循環史觀」，以解釋幾種文體生老病死的有機循環歷程，詳參龔鵬程：〈試論文學史之研究——以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為例〉，收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編：《古典文學》第5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3年），頁373-375。

<sup>20</sup>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頁1。

<sup>21</sup> 「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史觀在金元明清時期頗為流行，據錢鍾書的考證，金代劉祁首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其後說者漸多。參見錢鍾書：《談藝錄》（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據齊森華、劉召明、余意的考察，從金元以迄晚清王國維之〈宋元戲曲考序〉，持

文學革命為白話文取代言文之正當性、主流性書寫地位的情境中，與「進化論」正好不謀而合。黃人撰寫《中國文學史》已帶入「進化」的觀念，稱為「螺旋進化史觀」。前文引到 1922 年鄭振鐸〈整理中國文學的提議〉一文，提出三個原則，其中之一就是「文學進化觀念」；不過，他特別強調：所謂「文學進化」，非必後勝前，而是一時期有一時期文學之有機演進或蛻變。1927 年，鄭氏在〈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一文中，<sup>22</sup>更明確強調達爾文的進化論。同時，胡適所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國語文學史》大要〉、〈逼上梁山〉、〈《白話文學史》引子〉、〈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等幾篇文章的論述中，<sup>23</sup>「一代有一代文學」之說與「文學進化論」也被縮合成基礎性的史觀。而魯迅於 1924 年在西北大學演講〈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就提出一個觀點，小說的書寫由無意為之到有意為之，語言形式由短篇到長篇，由簡到繁，由文言到白話，這都是「進化」現象。<sup>24</sup>傅斯年 1928 年在中山大學所撰述《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sup>25</sup>也認為文體是一種生老病死的有機體，這顯然是「有機循環論」的舊調。他又加上「進化」的觀念，認為詩歌由四言、五言樂府到七言樂府，七言樂府

---

此說者至少有三十餘位，大多是戲曲家。顯見此說之流行於這一時期，主因與戲曲（亦及小說）之爭取進入正統、主流有關。此一觀念頗影響新文化運動時期，胡小石、魯迅、胡適、鄭振鐸、傅斯年等人之文學史觀，常加引用。詳見齊森華、劉召明、余意：〈「一代有一代之文學」論獻疑〉，《文藝理論研究》2004 年第 5 期，頁 43-49；另參周勛初：〈文學「一代有一代之所勝」說的重要歷史意義〉，《文學遺產》2000 年第 1 期，頁 21-32；王齊洲：〈「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文學史觀的現代意義〉，《文藝研究》2002 年第 6 期，頁 50-58。

<sup>22</sup> 鄭振鐸：〈研究中國文學的新途徑〉，《中國文學研究》下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年），頁 273-298。

<sup>23</sup> 胡適所倡導「平民／白話／活文學」與「貴族／文言／死文學」觀念，經常出現在他許多論述中，例如胡適：〈逼上梁山〉，收於胡適著，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 1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140-163；胡適：〈文學改良芻議〉、〈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收於胡適著，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 2 冊，頁 6-15、44-57、115-126；胡適：〈《國語文學史》大要〉、〈《白話文學史》引子〉，收於胡適著，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 8 冊，頁 132-137、149-152。

<sup>24</sup> 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收於魯迅著，吳俊編校：《魯迅學術論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 213-248。

<sup>25</sup> 傅斯年《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成稿於 1928 年，其後在臺灣出版，見傅斯年著，傅孟真先生遺著編輯委員會編：《傅孟真先生集》第 2 冊中編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52 年）；又傅斯年著，陳槃等校訂：《傅斯年全集》第 1 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 年）。

變而為詞，詞變而為曲，這是「文體進化」現象，因為越變越接近言語。出版於1929年，譚正璧的著作更直接把「進化」掛在書名上，稱為《中國文學進化史》。其後，這種「文學進化史觀」普遍成為那個歷史時期，絕大部分文學史書寫所延用。<sup>26</sup>這種從西方挪借過來，由「生物進化」轉用為「社會進化」，再轉用為「文學進化」的史觀，用之於詮釋中國古代文學史，究竟能有多大的確當性？在那個新知識分子普遍迷魅追求現代化的知識年代，這個問題從沒有人質疑過。

綜合觀之，「文學進化史觀」之進入中國文學史書寫，並非某一個文學史家獨特創見的理论，而是西方「生物進化論」先影響到社會學，適逢晚清以降中國知識分子追求現代化，就在這個歷史情境中，輸入這種思想，蔚為風潮；從社會文化的層面影響到文學層面，成為文學家們共持的「文化意識形態」。這是一種社會文化變遷歷程中，主流思潮「滲透性」的「泛影響」現象。

這種史觀是什麼？主要的概念是：1.文學隨時代變遷，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故古不必勝今，此為文明進化之公理。2.文學進化非出於無意識之自然演化，而出於有意識之「革命」。而文學革命的潮流，即天演進化之迹，而進化乃循序漸進。3.文學進化的現象表現在文體的形式上，一方面是由簡而繁，一方面是由束縛到自由解放；表現在內容上，由不合乎人性的死文學到合乎人性的活文學。從形式到內容都循著「進步」的軌則在變遷。

### （三）《中國文學史》浮濫的集體生產與教條化的「唯物史觀」

1950年以至於今，《中國文學史》的著作更是多達數百種，通代、斷代、分體皆有，以至浮濫地步；比較通行的是劉大杰、林庚之作的修訂版，<sup>27</sup>以及李劍國、馬積高、袁珂、嚴迪昌、程章燦、許總、李悔吾等，<sup>28</sup>

<sup>26</sup> 「文學進化史觀」在中國文學史書寫中的生成狀況，詳見由本人指導完成，王文仁：《近現代中國文學進化史觀之生成與影響》（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論文，2007年）；正式出版為《啟蒙與迷魅——近現代視野下的中國文學進化史觀》（臺北：博揚文化，2011年）。

<sup>27</sup>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於1957年第一次修訂，1962年第二次修訂，1973、1976年分兩卷做第三次修訂。林庚《中國文學史》於1954年更名《中國文學簡史》，由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印行，又於1988年出版修訂本，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印行，2002年由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在臺北印行。

皆有著述；然而多是分體及斷代，由一個人獨力完成的通史，已非常少見；即使有，品質也遠不如前一個歷史時期鄭振鐸、林庚等人的著作；香港則有柳存仁；臺灣學界也有羅錦堂、李曰剛、葉慶炳、黃公偉、孟瑤、王忠林等，<sup>29</sup>著述迭出。

這一時期，最應該嚴加反思批判者，實為一種浮濫的書寫現象。近現代《中國文學史》之因應京師大學堂「文學立科」而誕生，原本就是以「教科書」的面目登場，並非嚴謹的學術著作。教科書所述內容大體都是文學常識而已，其撰述意圖往往偏在文化或政治意識形態之形塑，以及市場商業利益之競逐，體質本就庸弱。前一個時期，魯迅、胡適、鄭振鐸、傅斯年、林庚等，在中國追求現代化的歷史處境中，自發性的投射「進化史觀」，雖是一種偏執的文化意識形態，其詮釋確當性讓人質疑；然而那種懷抱文化變革的理想與使命，獨力盡心撰寫一部《中國文學史》，自成「一家之言」的意圖，其實令人感佩。至於大學課程所引生的市場商業利益，根本不入考量。

1950年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創建，知識分子關懷文化社會變革的理想逐漸衰微，文學史書寫隨之受迫於政治威權，而變質為塑造政治意識形態的工具；或避開政治意識形態，而著眼於大學課程市場商業利益的競逐；故而意圖自成「一家之言」的文學史鉅著，已難得一見。撰寫型態，乃由一人獨力完成，而轉向群體合作生產，篇幅也越擴越大，兩三巨冊以上而

<sup>28</sup> 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4年）。馬積高：《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袁珂：《中國神話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臺北：時報文化，1991年）。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程章燦：《魏晉南北朝賦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李梅吾：《中國小說史漫稿》（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李梅吾：《中國小說史》（臺北：洪葉文化，1995年）。許總：《唐詩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年）。上列此一時期，大陸學界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文學史著作，悉見黃文吉：《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

<sup>29</sup> 柳存仁：《中國文學史》（香港：大公書局，1956年；臺北：臺灣東方書店，1958年；莊嚴出版社，1979年）。羅錦堂：《中國散曲史》（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6年）。孟瑤：《中國戲曲史》（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0年）；又孟瑤：《中國小說史》（臺北：文星書店，1966年）。黃公偉：《中國文學史》（臺北：帕米爾書店，1967年）。葉慶炳：《中國文學史》上、下冊（臺北：作者自印，1965、1966年；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年）。李曰剛：《中國文學流變史（三）——詩歌編》（臺北：聯貫出版社，1976年）；李曰剛：《中國詩歌流變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又李曰剛：《辭賦流變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王忠林等合著：《增訂中國文學史初稿》（臺北：福記文化，1985年）。上列此一時期，香港、臺灣學界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文學史著作，悉見黃文吉：《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

後足，價格當然也越賣越高。相較之上焉者，由資深學者數人合著，例如褚斌杰等三人、程千帆等二人，<sup>30</sup>或者以資深知名的學者掛帥主編，而實際則以多數資淺學者執筆撰寫，例如游國恩等主編、王文生主編、馬積高與黃鈞主編等。<sup>31</sup>下焉者則是一群不知名的年輕學子集體編著，例如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門化 1955 級集體編著、復旦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組學生集體編著、吉林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學史教材編寫小組編著、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編寫組編寫等。<sup>32</sup>而這種群體合著或集體編寫型態，規模篇幅達到最高峰者厥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總纂，北京大學、南京師範大學協作編纂的《中國文學通史》，根本就是 10 種斷代文學史的纂合。<sup>33</sup>這一時期的數十年間，文學史書寫彷彿如文字工廠之量化生產，數量不斷膨脹；但是品質也在下降，實在遠不如上一時期，可視為《中國文學史》書寫的衰退期。其間，相對值得關注者，厥為龔鵬程反思批判陳陳相因之眾作，意圖將教科書之文學史轉變為學術著作之文學史，而能成一家之言。<sup>34</sup>

除了上述競逐市場商業利益以至浮濫量產之外，這一時期最必須反思批判者，就是另一種舶來的文學史觀。前一時期普行的「文學進化史觀」

<sup>30</sup> 褚斌杰、袁行霈、李修生：《中國文學史綱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年），褚斌杰主撰先秦、秦漢文學；袁行霈主撰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學；李修生主撰宋遼金元明清文學。程千帆、吳新雷：《兩宋文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91 年）。

<sup>31</sup> 游國恩等主編：《中國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1964 年；臺北：五南圖書，1990 年）。王文生主編：《中國文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年）。馬積高、黃鈞主編：《中國古代文學史》（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2 年；臺北：五南圖書，1990 年）。

<sup>32</sup> 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門化 1955 級集體編：《中國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1959 年；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83 年）。復旦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組學生集體編：《中國文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58-1959 年）。吉林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學史教材編寫小組編：《中國文學史》（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59-1961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編寫組編：《中國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 年）。這種集體編寫文學史的型態，從一九五〇年代到一九九〇年代，甚為普行。上列著作悉見黃文吉：《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

<sup>33</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總纂，北京大學、南京師範大學協作編纂：《中國文學通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 年）。全套包括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唐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近代 10 種斷代文學史。

<sup>34</sup> 龔鵬程：《中國文學史》上、下冊（臺北：里仁書局，2009、2010 年）。此書反思批判過去所出版的《中國文學史》著作，並提出自己精當的文學史觀以及對歷代文學特殊的詮釋觀點，讓《中國文學史》這門知識展現不同以往諸作的新面目。

逐漸被馬列思想以經濟勞動生產及階級鬥爭為教條的「唯物史觀」所取代。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後，《中國文學史》的書寫與教學被視為建構國家意識形態的重要機制，因此從一九五〇年代開始，即以政治力量介入，支配著文學史的書寫與教學。以劉大杰為例，他出版於一九四〇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創建之前的《中國文學發展史》，到1957年，雖主動做了第一次修改；但是在當時政治情境中，也受到壓力而增刪若干內容，以符合政治意識形態；即使如此，1958年，針對高等學校所發動的「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劉大杰仍然受到嚴厲批判，而於1962年做了第二次修改。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劉大杰又受到嚴重衝擊，1973、1976年分2卷出版第三次修改本，主要是符合馬列及毛澤東思想所揭示階級鬥爭的文學本質觀與史觀。他在1976年出版的第2卷中，明白強調：「階級鬥爭不但是推動歷史發展的動力，也是促進文學發展的動力。」<sup>35</sup>這個時期，劉大杰如此，其他如游國恩、柳存仁等，莫不如此。<sup>36</sup>中國文學史書寫，「文學進化史觀」已被馬列及毛澤東思想以經濟勞動生產及階級鬥爭為信條的「唯物史觀」所取代。而這種史觀之被文學史作者所持用，與前一時期「進化史觀」不同之處，乃非出於自由意志而懷抱文化變革理想的自發性表現，而是在政治威權之下，被迫接受而做為教條式的口號。

至於同一時期，臺灣學界的文學史書寫，大多數沒有什麼特定的史觀。王忠林與邱燮友等人合著的文學史，從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轉出所謂「民生史觀」。<sup>37</sup>在那個兩岸政治對立的年代，國民黨統治臺灣，教條式的三民主義教育也形塑了臺灣知識分子的黨國意識形態；所謂「民生史觀」與「唯物史觀」同樣充滿與中國古代文學的本質、起源與流變無關的政治意味，其詮釋效力都讓人質疑。

綜合上述觀之，「中國文學史」書寫幾十年來幾種最主要的史觀都是自西方移入。而中國古代有沒有「原生性」的文學史觀？這問題似乎很少有人注意，遑論做出深入研究而有系統的加以重構。

---

<sup>35</sup> 劉大杰受到政治上嚴厲的批判，三次修改《中國文學發展史》，詳參董乃斌、陳伯海、劉揚忠主編：《中國文學史學史》第2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95-100。

<sup>36</sup> 游國恩等主編：《中國文學史》；柳存仁：《中國文學史》。

<sup>37</sup> 王忠林等合著：《增訂中國文學史初稿》。

一九九〇年代，大陸中文學界，對這門百年學科之大量生產卻又始終缺乏本質論、認識論與方法學基礎，開始不滿而進行全面的反思、批判，乃逐漸形成探討、撰述「文學史理論」的熱潮；<sup>38</sup>如今已出現許多這方面的著作，例如陳平原《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戴燕《文學史的權力》、陳伯海《中國文學史之宏觀》、陶東風《文學史哲學》、林繼中《文學史新視野》、王鍾陵《文學史新方法論》、陳國球《文學史的書寫型態與文化政治》等。<sup>39</sup>文學史理論或哲學的思辨，就是針對「文學史」之為一種特殊的知識或一門特定的學科，所涉及的幾個基本問題，諸如文學如何成為歷史的存在？「文學史」是什麼性質的知識？又如何被我們所認識？它應當如何去書寫？就從這些本質論、認識論與方法學的問題，去建立切當的理論或哲學基礎。其中，本質論涉及文學史作者對文學是什麼？如何成為歷史的存在？如何發生？如何演變？這種種問題所持之基本假定的觀念，也就是文學史作者究竟秉持什麼「文學史觀」以詮釋文學的歷史？這種最基本的文學史觀，依循上文的論述，晚清以降的中國文學史書寫，一九二〇年代之前的著述，頗呈匱乏。後起的年代，有些著作雖然持有文學史觀，卻又舶來於西方。

至於一九九〇年代開始的文學史理論熱潮，所表現的狀況卻是：或破而不立，只側重在對前代著作的批判，指摘其匱乏與謬誤；或以現代的文學經驗與知識，進行個人規創性的論述；或介述、挪借西方的理論。其中，有關「文學史觀」的論述，很少有學者能深入中國古代繁富的史料中，考察、詮釋第一手文本，以重構種種支配、影響中國文學歷史發展之「原生性文學史觀」的實質內容，以建立源自傳統文化內在的「詮釋模型」，轉而應用於中國文學史的書寫。其間，雖有觸及此一議題者，對源流、正變、

<sup>38</sup> 對文學史書寫的批判，此一風潮發端於1985年間，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聯合在《文學評論》第5期刊載長篇論文〈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稍後又於《讀書》雜誌討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文學史觀〉。大約同時，臺灣學者龔鵬程也撰寫〈試論文學史之研究——以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為例〉，對晚清以降，有「中國文學史」書寫的方法學提出強烈批判。影響所及，九〇年代以來，文學史理論遂成為學術熱潮。

<sup>39</sup> 陳平原：《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桂林：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戴燕：《文學史的權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陳伯海：《中國文學史之宏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陶東風：《文學史哲學》（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林繼中：《文學史新視野》（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王鍾陵：《文學史新方法論》（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3年）。陳國球：《文學史的書寫型態與文化政治》。

代變等觀念有所論述，卻或零散不整，或表淺不深。這一類著作，最集中規模者當數董乃斌等人主編之《中國文學史學史》。其第1卷即為〈傳統的中國文學史學〉，從先秦以迄清代，依序描述、詮釋各代文學家有關「文學史」的論述，對「源流」、「正變」、「代變」諸史觀有輪廓性的概略描述。<sup>40</sup>又例如周勛初〈文學「一代有一代之所勝」說的重要歷史意義〉、王齊洲〈「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文學史觀的現代意義〉、齊森華、劉召明、余意〈「一代有一代之文學」論獻疑〉等，<sup>41</sup>對「代變」此一「文學史觀」，做了比較適切的論述；「代變」的文學史觀之所以受到關注，應該是由於和西方的「文學進化史觀」能彼此結合；但是，諸論述仍然未能對這些「原生性文學史觀」整體的「詮釋模型」義涵，完成系統化的「重構」。從《中國文學史》書寫的基礎理論而言，這種「重構古代『原生性』文學史觀」的工作應該值得去做。這就是本文之所以從反思批判近現代學術史陳陳相因之迷蔽，所導出的「問題」。

## 二、中國古代「原生性文學史觀」重構之意義及「正變」關鍵詞釋義

### （一）重構中國古代「原生性文學史觀」的意義

綜合前文的論述觀之，「中國文學史」書寫幾十年來，幾種最主要的史觀都是自西方移入。「文學史」是一種具有民族性、區域性的知識，很難藉由其他民族、區域為中心或本位所建構的史觀，做出相應、切當的詮釋。從西方挪借的文學史觀既缺乏詮釋效力，那麼中國古代有沒有「原生性」的文學史觀可資應用？這問題很少有人注意，遑論做出深入研究而有系統的加以重構。所謂「原生性」意指一種事物相對於「外植」者，具有原生於其民族文化自身之歷史經驗及價值觀念系統的特性。準此，所謂「原生性文學史觀」，指的就是相對於「進化論」、「唯物論」這些自西方「外植」的史觀；諸如源流、正變、通變、代變等，它們都是原生於中國民族文化自身之歷史經驗及價值觀念系統的史觀。

<sup>40</sup> 董乃斌、陳伯海、劉揚忠主編：《中國文學史學史》第1卷，頁55-84、141-188、300-313、322-333、446-457。

<sup>41</sup> 周勳初：〈文學「一代有一代之所勝」說的重要歷史意義〉，頁21-32；王齊洲：〈「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文學史觀的現代意義〉，頁50-58；齊森華、劉召明、余意：〈「一代有一代之文學」論獻疑〉，頁43-49。

王鍾陵在反思過往的中國文學史書寫之後，對於文學史研究的方法論，曾提出「原生態式的把握」，以尋求「如何使歷史真實的第二重存在盡可能地符契於歷史真實的第一重存在」。他所謂「歷史真實的第一重存在」，指的就是直接史料之客觀他在性文本所涵蘊的中國古代文學歷史，而「歷史真實的第二重存在」指的則是現代諸多「中國文學史」書寫所呈現的中國古代文學歷史。他所意圖警示的乃是當代學者的中國文學史書寫，必須「盡力減低從歷史真實的第一重存在向其第二重存在轉化時所必定會發生的簡單化以至於歪曲化的程度」。<sup>42</sup>這一論述，針對一九二〇年代以降，秉持「進化論」與「唯物論」為單一性史觀的文學史書寫，所做出的反思批判，相當具有說服力，值得我在這裡呼應。

本論文所提出「原生性文學史觀」，即蘊涵於王鍾陵所謂「歷史真實的第一重存在」中。我曾在提出「完境文學史」的構想時，指認了「原生性文學史觀」是文學家之為歷史性存在主體「意識結叢」的一部分，也是構成文學歷史諸多要素的一部分。<sup>43</sup>中國古代文學從「創作」到「批評」，在作者與讀者、批評者的意識中，對文學的本質與功能、起源因素與流變規律、文體性徵與價值品第等，這些構成「文學歷史」的要素，都以源流、正變、通變、代變這四種觀念進行理解、詮釋，並付諸創作與批評的「實踐」。因此，這四種史觀根本就涵在中國古代文學「歷史真實的第一重存在」中，乃構成中國文學歷史諸多要素的一部分。我們站在現代，進行《中國文學史》書寫，這正是「歷史真實的第二重存在」之理解、詮釋行為，當然必須揭明這四種「原生性文學史觀」，以做為理解、詮釋中國古代文學歷史的基準，才可能獲致主客「視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的詮釋而具有確當性。<sup>44</sup>

<sup>42</sup> 王鍾陵：《文學史新方法論》，頁 75-76。

<sup>43</sup> 顏崑陽：〈混融、交涉、衍變到別用、分流、佈體——「抒情文學史」的反思與「完境文學史」的構想〉，《清華中文學報》第 3 期（2009 年 12 月），頁 113-154。

<sup>44</sup> 「視域融合」指通過詮釋學經驗，詮釋者和文本獲致某種共同的視域，同時詮釋者於文本的他在性中理解了文本的意義。參見〔德〕漢斯－格奧爾格·加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著，洪漢鼎譯：《詮釋學 I：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Hermeneutik I: Wahrheit und Methode: 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臺北：時報文化，1993 年），頁 399-401。

準此，我們所謂「原生性文學史觀」，主要就是源流、正變、通變、代變四種。這四種史觀，在古代典籍中很少論述詳實而完整的專著，大多是單篇或片言隻語的文本散置在各種典籍，而且語言表述形式幾乎都沒有明顯的「系統」；然而，古代諸多文士對這四種史觀紛紜的論述，有沒有彼此交集而隱涵大體的系統？答案是，有，可稱為「隱性系統」；那麼，有關這四種文學史觀諸多散置的文本，在現代人文學術研究中，若能經由學者的詮釋而揭顯其隱涵的系統，加以「重構」為現代話語形式的「顯性系統」而形成「詮釋模型」(interpretive model)，即可應用於《中國文學史》的書寫。所謂「詮釋模型」指的是可以做為詮釋經驗現象之意義的模型化理論。模型(model)一詞有其分歧義，它通常指的是「一組多個因素的關係形式」，往往是具有廣延性的範疇。我們在這裡就用它來指涉：掌握實存經驗現象的某些普遍性質、結構或規律，將它抽繹出來，找出各因素的統合關係，而定型化為一種系統性理論，可反覆操作，應用在同類或類比的研究對象上，以遂行分析、詮釋的目的，就稱為「詮釋模型」。其中，最基本的「源流文學史觀」，其「詮釋模型」的重構，我在幾年前就已完成。<sup>45</sup>接著，我們將在本論文中，對「正變文學史觀」進行系統性的重構。

(二) 「正」、「變」、「正變」三詞的本義及所引申的一般概念義及其應用於「文學史」的詮釋所涵具的理論性意義。

首先，我們試問何謂「正」？從詞義分析而言，辭典所釋「正」的基本義為「是」，《說文》：「正，是也。從一，一以止。」段注：「一所以止之也。」而「一」之義，《說文》云：「一，惟初太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sup>46</sup>「道」涵有形上學的「本體」義，其「用」乃創生、化成天地萬物，故《老子》第42章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而「一」的涵義非常複雜，與「道」關聯的形上學之義，乃先驗、無形的「道」，是為「無」，故王弼注云：「萬物萬形，其歸一也。何由致一？由於無也。」<sup>47</sup>「無」進至創生之始，混沌不分之「象」，是為「一」，是為「有」。

<sup>45</sup> 顏崑陽：〈中國古代原生性「源流文學史觀」詮釋模型之重構初論〉，《政大中文學報》第15期(2011年6月)，頁231-272。

<sup>46</sup> 分見〔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頁70、1。

<sup>47</sup> 〔春秋〕老子著，〔魏〕王弼注：《老子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年)，第42章，

《莊子·天地》云：「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郭象注：「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sup>48</sup>則「一」乃是萬物創生，從「無」到「有」，渾然一體而尚未分化的「初始」之「象」，蘊涵萬物變化的一切可能，故郭象稱之為「至妙」；妙者，變化無方。相對於個別一物之「有限」，郭象所謂「物理之形」，則此「至妙」之「一」，蘊涵萬象變化的一切可能，是為「無限」；無限，則不偏、不固、不缺、不窮，是為「完善」，是為「理想」；故而中國古代文化思想中的形上之「道」，涵有「完善」的理想價值之義，能止一切傾斜偏狹之事物，故云「一以止」。即此而言，「正」具有根源、初始、本質的「體」之義，而相對的由此「體」以生化萬物，則具有流變、演進、現象的「用」之義，體用相即不離，故《莊子·逍遙遊》云：「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sup>49</sup>這是「正」在字源上所涵有哲學性的基本義，引申而被運用到諸多不同「語境」，所衍生的一般性概念頗多，其中與「正變文學史觀」之詮釋有關者約為三義：

1. 「正」者，「常」也，《晉書·謝玄傳》云：「安嘗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sup>50</sup>此句中的「正」字，其意是「常」，故「正常」合義為複詞；「常」有「法」之義，《國語·越語下》：「無忘國常」，韋昭注云：「常，舊法。」<sup>51</sup>「常」也有「不變」之義，《周易·坎》云：「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sup>52</sup>「常」，不變也。綜合言之，「正」即是「常」，指事物具有恆常不變，可以為法的本質。
2. 「正」者，「不傾斜」也。《周易·繫辭下》：「吉凶者，貞勝者也。」韓康伯注云：「貞者，正也，一也。」孔穎達疏云：「正者，體無傾邪。」<sup>53</sup>其義指事物「中正」、「完善」或「完備」的狀態。

---

頁 89、90。

<sup>48</sup> 〔戰國〕莊周著，〔清〕郭慶藩集釋：《莊子集釋》（臺北：河洛圖書，1974年），頁 424-425。

<sup>49</sup> 同上註，頁 17。

<sup>50</sup> 〔唐〕房玄齡等著，〔清〕吳士鑑、劉承幹輯注：《晉書輯注》第 2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年），卷 79，頁 1372。

<sup>51</sup> 〔春秋〕左丘明著，〔三國〕韋昭注：《國語》（臺北：九思出版公司，1978年），卷 21，頁 651。

<sup>52</sup>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3年），卷 3，頁 72。

<sup>53</sup> 同上註，卷 8，頁 165。

3. 「正」者，「始」也。《後漢書·陳寵傳》：「天以為正，周以為春。」李賢注云：「正、春，皆始也。」<sup>54</sup>故一年之「始」為「正月」。

接著，我們試問何謂「變」？從詞義分析而言，辭典所釋「變」的基本義為「更」，《說文》云：「變，更也。」<sup>55</sup>「更」就是改易，引申而被運用到諸多不同「語境」，所衍生的一般性概念頗多，與「正變文學史觀」之詮釋有關者約為三義：

1. 「變」者，「化」也。而「化」的本字為「匕」。《說文》云：「匕，變也。」段玉裁注：「凡變匕，當作匕；教化，當作化。……今變匕字盡作化，化行而匕廢矣。」<sup>56</sup>那麼「化」又是何義？《荀子·正名》：「狀變而實無別而為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sup>57</sup>準此，「變」與「化」互訓，故往往合義為複詞「變化」，其一般性概念就如上引《荀子》的釋義，所謂「狀變而實無別而為異者，謂之化」，其意為一種事物的外形改變了，但卻還是同一實體，最典型的例子是一個人，從童年到老年，形貌改變了，卻同一個實體而無別。事物改易其狀態而實體卻不變，則原來的事物與變異後的事物，並非完全異體之二物；也就是其各殊的「偶有性」改變了，但是共同的「本質性」卻沒有改變。例如一個人，由「少年」變而為「老年」，其形貌的「偶有性」改變了，頭髮由黑變成白、皮膚由光滑變成粗皺；但是，其「體」卻都同樣是那個人，並未變成另一實體。如此，則前後二者的關係，雖變易卻彼此有其接續，雖彼此有其接續卻又另顯其殊態。
2. 「變」者，「動」也。《禮記·檀弓上》：「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鄭玄注云：「變，動也。」<sup>58</sup>事物「改變」的現象，即是出於「動力因」的作用。一切事物的存在必須「動」而能「變」，「變」而能「動」，

<sup>54</sup> [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注，[清]王先謙集解：《後漢書集解》第1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卷46，頁555。

<sup>55</sup>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125。

<sup>56</sup> 同上註，頁388。

<sup>57</sup> [戰國]荀卿著，[清]王先謙集解：《荀子集解》（臺北：世界書局，1971年），卷16，頁279。

<sup>58</sup>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3年），卷6，頁117。

故「變」、「動」合義成詞為「變動」。《莊子·逍遙遊》在「乘天地之正」後，續云「御六氣之辯」。「辯」就是「變」。而「變」就是「化」，就是「動」。萬物的本體恆常不變；但是經驗現象，卻是變化、運動不定。

3. 「變」者，「奇」也。《白虎通·災變》云：「變者，何謂也？變者，非常也。」<sup>59</sup>「非常」就有「奇特」之意。張衡〈西京賦〉：「盡變態乎其中。」薛綜注云：「變，奇也。」<sup>60</sup>故「變」即是個殊創造之事物所顯現不同於「正常」的「奇姿異態」。

再接著，我們試問：「正」與「變」合為複詞「正變」，又是什麼涵義？它涵具下列三義：

1. 「正變」表徵事物「體用相即」之存有。「正」為「體」而「變」為「用」。「正」之「體」為其本然完善的普遍存有，「變」之「用」為其改易分化的特殊經驗現象之存在。中國古代就以「正變」這一組「二元對立」而「辯證統一」的概念去詮釋宇宙萬物的生成、存在、演變。「正變」就是「道」之體用相即、動靜往復的存有。《莊子·逍遙遊》云：「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烏乎待哉！」<sup>61</sup>莊子最早將「正」與「變」對舉，以明萬物「體用相即」，本體不離現象，而現象不離本體的存有。吾人若能經由「虛靜」的修養工夫，朗現契「道」的「心體」，守其「正」而應其「變」，即能「無待」而逍遙。
2. 「正」與「變」分別表徵二種對立的事物典型。「正」是顯現某一類事物本質性的典型，故為此類事物之常態；而「變」則是相對於「正」，顯現個別事物偶有性的殊型，故為事物之「奇姿」。二者形成「對比互顯」而「彼此依存」的形構性關係，亦即有「正」才有「變」，而有「變」也才有「正」。
3. 「正」與「變」表徵事物前後演化的動態歷程關係。「正」有「始」義，為「形變之始」，故當「正變」並舉時，「正」必在先，而「變」

<sup>59</sup> 〔漢〕班固編，〔清〕陳立疏證：《白虎通疏證》上冊（臺北：廣文書局，1987年），卷6，頁320。

<sup>60</sup> 〔漢〕張衡著，〔三國〕薛綜注：〈西京賦〉，收於〔南朝梁〕蕭統編，李善注：《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82年），卷2，頁40。

<sup>61</sup> 〔戰國〕莊周著，〔清〕郭慶藩集釋：《莊子集釋》，頁17。

必隨後而出於「正」。因此，「正變」常與「源流」配用，而以「正」為「源」，以「變」為「流」。然則，事物之「正變」不僅靜態的存在著「對比互顯」而「彼此依存」的形構性關係，更涵有二元對立而辯證統一的動力因素，以推進事物不斷的演化，彼此形成動態歷程性的關係。而必須特別注意的是，在時間歷程中，「正」與「變」並非由「始」至「終」，單一直線的先後關係，而是多階段「正」與「變」互為先後，彼此相生的輪換歷程，即此一階段由「正」而「變」，接續則此一階段之「變」轉為新型態之「正」，以啟下一階段之「變」，如此「正」與「變」相對相循，不斷推演，直到此一事物窮盡而散滅。

最後，我們試問的是，「正」與「變」合義成詞，應用於「文學史觀」的詮釋，涵具什麼樣的理論性意義？中國古代「正變文學史觀」即依上述「正變」三義而構成，故「正變」一詞應用於「文學史」的詮釋亦有三義：

1. 「正變」表徵事物「體用相即」之存有。「正」為「體」而「變」為「用」；此義往往在追討文學本體性根源時，才會用到，例如《文心雕龍》對文學的論述始乎〈原道〉，則「道」當然是「體」、是「正」，為一切文學之所從出，最能完善實現「道」的「經」，也就是一切文章本體性的「正典」。其他文章，都是此「體」之「用」，都是此「正」之「變」、此「源」之「流」，故《文心雕龍·序志》云：「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條枝。」<sup>62</sup>這是「正變」一詞，在文學「體用」論述中的意義。從文學史觀而言，這種論述涉及文學的「創生」與「演變」的基本原理。
2. 當文學由本體性的根源層次，落實於歷史性的「文體」，則「正」與「變」分別表徵二種對立的體製或體式。<sup>63</sup>「正」即「正宗（正體）」，可有二義：一是體製之形構的「初備」或「完備」；二是體式之美感形相的「雛貌」或「完善」。這二義都是文體之「常態」；而「變」

<sup>62</sup> [南朝梁]劉勰著，周振甫注釋：《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1984年），頁915。

<sup>63</sup> 「體製」或稱為「體裁」，指的是「某一種文類諸多個別篇章共同的語言組構形式」，也就是《文心雕龍·通變》所謂「設文之體有常」的「常體」。「體式」指一種文類理想性的美感形相，例如詩之「典雅」、詞之「婉約」。參見顏崑陽：〈論「文體」與「文類」的涵義及其關係〉，《清華中文學報》第1期（2007年9月），頁1-67。

為「變格（變體）」，則是相對於「正」，顯現形構破格的體製或美感形相偏倚的體式，是為文體之「奇姿」。《文心雕龍·知音》所標「六觀」之四，曰「觀奇正」；其所謂「奇」者，即是此意。<sup>64</sup>「正宗」與「變格」二者形成「對比互顯」而「彼此依存」的結構性或樣態性關係，亦即有「正宗」才有「變格」，而有「變格」也才有「正宗」。

3. 「正宗」（正體）與「變格」（變體）表徵文體前後演化的動態歷程關係。「正」有「始」義，為「形變之始」，故當「正」與「變」對舉時，「正宗」之文體（正體）必在先，乃「初始之體」；而「變格」之文體（變體）必隨後而出於「正宗」，乃「演化之體」。因此，「正變」常與「源流」配用，而以「正宗」為「源」，以「變格」為「流」。許學夷《詩源辯體》、<sup>65</sup>葉燮《原詩》、<sup>66</sup>陳廷焯《白雨齋詞話》，<sup>67</sup>皆將「源流」與「正變」配合論述，後文再做討論。

然則，文體之「正變」不僅靜態的存在著「對比互顯」而「彼此依存」的形構性、樣態性關係，更涵有二元對立的動力因素，以推進文體不斷的被創化，彼此形成動態歷程性的關係。不過，如前文所論述，在時間歷程中，文體的「正」與「變」並非由「始」至「終」，單一直線的先後關係，而是多階段「正」與「變」互為先後，彼此相生的輪換歷程，即此一階段由「正」而「變」，接續則此一階段之「變」轉為新型態之「正」，以啟下一階段之「變」，如此「正」與「變」循環辯證，不斷推演，直到此一事物窮盡而散滅。葉燮《原詩》所提出「源流正變」之說，就是這種多階段相對性「正變」的觀念，後文將會細論。

至於，對「正」與「變」的評價，孰高孰低？這已是第二序的問題，沒有必是之義，完全視文論家的立場、審美價值觀而定。當然也會因此而決定彼此各異的史觀，或以「正」為高而主張「學古」，故重視對傳統的因承；或以「變」為上而主張「創新」，故重視對未來的開展。

<sup>64</sup> 〔南朝梁〕劉勰著，周振甫注釋：《文心雕龍注釋》，頁888。

<sup>65</sup> 〔明〕許學夷著，杜維沫校點：《詩源辯體》（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

<sup>66</sup> 〔清〕葉燮著，霍松林校注：《原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

<sup>67</sup> 〔清〕陳廷焯著，屈興國校注：《白雨齋詞話足本校注》上、下冊（濟南：齊魯書社，1983年）。

### 三、「正變文學史觀」詮釋模型之重構

#### (一)「正變」觀念的前行研究

「正變」之做為一種詩學觀念，較早而有系統的研究、論述，當推朱自清《詩言志辨》，最後一個單元的主題就是「正變」。他從《詩經》毛傳、鄭箋、孔疏開始，歷述各代相關文獻，一直討論到清代汪琬〈唐詩正序〉、葉燮《原詩》。他將詩學「正變」觀念分為「風雅正變」與「詩體正變」二種類型。「風雅正變」是以《詩經》毛傳、鄭箋、孔疏為主要對象，延伸討論到清代汪琬〈唐詩正序〉的論述。《詩經》風雅之詩為「正」或為「變」，乃由政教之治亂感乎民心而生安樂哀傷怨怒之情所決定；反過來看，從詩歌所抒之情或為樂或為哀或為怨，也可以觀政教之治亂得失、風俗之盛衰厚薄。「詩體正變」則從魏晉六朝以降的詩體為對象，討論諸多文人對「詩體」之或「正」或「變」的論述，從六朝鍾嶸〈詩品序〉、劉勰《文心雕龍》的〈明詩〉、〈通變〉、〈時序〉諸篇，歷述各代相關文獻，一直討論到元代楊士弘《唐音》的〈敘目〉，明代高棅《唐詩品彙》的〈總敘〉、顧炎武《日知錄》的〈詩體代降〉，以至清代葉燮《原詩》。「詩體正變」不同於「風雅正變」，並非由政教之治亂所決定，而是由詩之「體」本身的源起、流變所決定。<sup>68</sup>

朱自清對詩學「正變」觀念所做分別類型的論述，大體已為此一觀念做出源起、發展歷程的概要描述及詮釋；但其中存在一些值得再思辨的問題。後進學者崔文娟，由我指導而完成的《中國詩學「正變」觀念析論》，已針對朱自清的「風雅正變」之說提出批判，其中有一項指摘朱自清研究方法之失當，認為朱自清採用大量文獻資料，鉅細靡遺的羅列各種可能的相關影響源頭；但羅列的資料未必見出與「正變」有內部必然的關聯性，最後也未做系統性的綜合。這屬於「發生研究法」，只依觀念發生的程序，注重歷史事實的敘述，而缺乏系統性的整合統貫，只見片段的事實，而不見觀念的整體。因此，崔文娟轉從系統性的整體觀念進行分析、綜合，而將「風雅正變」分解為「時代正變」與「情志正變」，而以「時代正變」為「風雅正變」說的第一重涵義，「情志正變」為第二重涵義。<sup>69</sup>而「風雅正

<sup>68</sup> 朱自清：《詩言志辨》（臺北：頂淵文化，2001年），頁133-169。

<sup>69</sup> 崔文娟：《中國詩學「正變」觀念析論》（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

變」的意義是由「時代」和「情志」兩個面向共同組成，特別是在「時代」與「情志」的相互對照之下形成。<sup>70</sup>崔文娟的批判頗為貼切，而所提出「風雅正變」的二重涵義比諸朱自清所論述的「風雅正變」更見觀念系統的明晰度。她在分析「風雅正變」的二重涵義之外，也承繼朱自清所說的「詩體正變」之說，做了更具系統性的論述。這都是就「正變」觀念所做的整體論述，從朱自清到崔文娟，此一觀念大致已系統完整。

稍後由董乃斌、陳伯海、劉揚忠所主編《中國文學史學史》，第1卷〈傳統的中國文學史學〉即立有專節「風雅正變論」、「『源流本末正變盛衰互為循環』說的提出」。前者討論「風雅正變」，粗略而混雜失焦，所陳述頗多無關乎「風雅正變」觀念本身；而對於「風雅正變」觀念本身，反而未能做出精密的分析。<sup>71</sup>文中沒有提到朱自清，所論卻遠不及朱自清的《詩言志辨》。「『源流本末正變盛衰互為循環』說的提出」一節，主要是針對清代葉燮《原詩》而論，延伸述及薛雪、紀昀的文學史觀。與「風雅正變」一節相較，這個議題論述得比較詳切，不過一則大多只是依據《原詩》相關文本，進行語言表層義的描述及詮釋，並且仍然僵持文學「進化論」與「退化論」對立，這種缺乏詮釋效用的觀念；甚至明顯的揚「變」而抑「正」。<sup>72</sup>現代學者面對古代歷史應該採取相對客觀、超越的立場、觀點，進行深切的詮釋，以明其何以然；而不宜在主「正」或主「變」之間，主觀的揚此而抑彼。

「正變」觀念之總體的論述非常複雜，前行研究已見其大體，我們不再重複；本文只聚焦在「正變」觀念所隱涵的「文學史觀」，如何經由精切的分析、綜合而重構為系統性的詮釋模型，以資運用在「中國古代文學史」的書寫？然則，首先要問的是：「正變」觀念之中，是否隱涵著系統性的「文學史觀」意義？

這一問題，朱自清沒有「顯題化」處理，崔文娟則明白提出：由「正變」觀念所形成的「文學史觀」有三種：一是「風雅正變文學史觀」，二是「詩體正變文學史觀」，三是「源流正變文學史觀」。<sup>73</sup>這樣的提法，仍然停

論文，1990年），頁8-10。

<sup>70</sup> 崔文娟：《中國詩學「正變」觀念析論》，頁57。

<sup>71</sup> 董乃斌、陳伯海、劉揚忠主編：《中國文學史學史》第1卷，頁55-69。

<sup>72</sup> 同上註，頁446-457。

<sup>73</sup> 崔文娟：《中國詩學「正變」觀念析論》，頁143-159。

滯在第一序，只就個別文獻所顯示的實況分別做出描述與詮釋。第一種「風雅正變文學史觀」是就「詩經學」的文獻立說；第二種「詩體正變文學史觀」是就以文體論為基礎之一般文學史觀論述的文獻立說，而依據劉勰《文心雕龍》、葉燮《原詩》、高棅《唐詩品彙》進行詮釋。至於第三種，則重心乃就葉燮《原詩》所特意提出的「源流正變文學史觀」而立說。準此，這樣的論述尚未能跨越不同文獻的界限，而由論述者提出第二序後設性的文學史理論觀點，針對「正變」之做為「文學史觀」所隱涵系統性的「詮釋模型」，進行深度的詮釋與重構。

至於董乃斌、陳伯海、劉揚忠所主編《中國文學史學史》，既將「正變」置入「中國文學史學史」的知識脈絡以資論述，本應聚焦、系統的顯發其「文學史觀」的意義；但是所論述的內容，仍然分別從「風雅正變」與葉燮為主的「詩體源流正變」，而依文獻進行整體的概述，並未聚焦出「文學史觀」的後設性論點以進行系統性的詮釋與重構，而這正是本論文所擬定的論題。

## (二)「正變文學史觀」二種「詮釋模型」之重構

### 1. 什麼是「正」？什麼是「變」？是什麼在「變」？

在綜合的重構「正變文學史觀」二種「詮釋模型」之前，我們必須先分析、詮釋構成這二種「詮釋模型」的必要因素、條件。分析、詮釋當由提問開始，那麼我們就將這些因素、條件加以問題化。這系列問題在「詮釋模型」的系統內，一個接一個，具有結構性、歷程性的邏輯關係：從文學而言，什麼是「正」、什麼是「變」？是什麼在「變」？「正」與「變」的時序關係如何？「變」有其規律嗎？「變」的原因、條件是什麼？文體的「正」與「變」是否涵具價值性？對於這些問題的回答，我們將依據二層序位的文本，進行分析、詮釋。第一層序位是文學創作實踐的歷史經驗現象；第二層序位是古代文人對「正變」的論述。這二層序位的相關文本，有時必須相互詮釋，彼此印證。

什麼是「正」？什麼是「變」？以及是什麼在「變」？這三個問題必須合著回答。依據前文對於「正」與「變」二詞基本義的分析，它們分別表徵二種對立的事物範式。既是「事物」，當然就是經驗界可感知的實存之物，而非僅是抽象的概念。從文學來說，經驗界可感知的實存之物，就是具體的作品；作品是個殊的詩文篇章，繁多到無以計數；「文學史」的認知，

不可能僅是一一的詮釋繁多到無以計數的個殊作品，而必須掌握繁多作品所內具的某些相對「普遍性」及「規律性」，才能建構有效性的知識。所謂繁多作品所內具的某些相對「普遍性」，就是多數作品「聚同」的文類之「體」，稱為「類體」。「類體」又可分為語言形構由相對普遍性所形成的「體製」，例如四言古體、五言古體、五言律詩、七言律詩、五言絕句、七言絕句等；以及由體製形構所對應之功能，作家依此形構功能具體表現為「完善」的美感形相，因而形成眾所取法模習的「體式」（體格），例如《文心雕龍·明詩》：「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sup>74</sup>「四言詩」是一個「文類」，它「完善」的美感形相而可為取法模習的「體式」是「雅潤」。而「五言詩」也是一個「文類」，它「完善」的美感形相而可為取法模習的「體式」是「清麗」。「體製」與「體式」統合的概念，就是「文體」。準此，從「文學」的觀點來看，「正」與「變」指的就是二種相對的「文體」範式。「正」指的是「初備」或「完備」的「體製」，以及「雛貌」或「完善」的「體式」，乃文體之「常態」；相對的，「變」指的是「破格」的「體製」與「偏美」的「體式」，是為文體之「奇姿」。

接著，我們試問：從「文學」及「文學史」的觀點來說，是什麼在「變」？當然就是「文體」之中的「體製」及「體式」在「變」。這就是所謂「詩體正變」，擴大而言，就是「文體正變」。

論述到這裡，我們必須先處理一個問題：「風雅正變」與「詩體正變」有分嗎？朱自清《詩言志辨》中，將「正變」分為「風雅正變」與「詩體正變」。<sup>75</sup>這種區分，清代葉燮在《原詩》中就已提出，云：

夫風雅之有正有變，其正變係乎時，謂政治、風俗之由得而失，由隆而污。此以時言詩；時有變而詩因之。時變而失正，詩變而仍不失其正。故有盛無衰，詩之源也。吾言後代之詩，有正有變，其正變係乎詩，謂體格、聲調、命意、措辭，新故升降之不同。此以詩言時，詩遞變而時隨之。故有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之互為盛衰；惟變以救正之衰，故遞衰遞盛，詩之流也。<sup>76</sup>

<sup>74</sup> 〔南朝梁〕劉勰著，周振甫注釋：《文心雕龍注釋》，頁85。

<sup>75</sup> 朱自清：《詩言志辨》，頁133-169。

<sup>76</sup> 〔清〕葉燮著，霍松林校注：《原詩》，「內篇上」，頁7。

葉燮明白將「正變」分為「係乎時」、「以時言詩」的「風雅正變」與「係乎詩」、「以詩言時」的「詩體正變」。這二個「時」的涵義不同，「以時言詩」的「時」，是政教治亂的社會情境之義，例如周文王、武王、成王之治世、厲王、幽王之衰世；「以詩言時」的「時」，是詩風雅俗正變的不同文學時期之義，例如盛唐、中唐、晚唐之分，唐詩、宋詩之別的「時」。

「風雅正變」其實是一個因承傳統「詩經學」的論題，從〈詩大序〉到鄭玄〈詩譜序〉就建構完成；前揭朱自清《詩言志辨》、崔文娟《中國「正變」詩學觀念析論》、董乃斌等所主編《中國文學史學史》，都已論述詳實，不贅述。然則，從此一論題的發生事實而言，古代就已有「風雅正變」與「詩體正變」之分；而二者的論述似乎各成系統，沒有交集。

毛、鄭「風雅正變」之說不是從「文學」或「文學史」的立場、觀點發言，而是從「經學」的立場、觀點立論。在「經學」的語境中，毛、鄭提出「風雅正變」之說，其意圖就如葉燮所謂「以時言詩」，從詩的內容所表現的「情性之正」或「情性之真」，以「觀」政教之治亂、風俗之厚薄，也就是「以詩觀時」，乃孔子「詩可以觀」的實際操作。政教平治、風俗淳厚，反映於詩，必表現臣民的「情性之正」；正者，情性平和中正而安以樂，是為正風、正雅；政教衰亂、風俗澆薄，反映於詩，必表現臣民的「情之真」。真者，直接發乎情，全無虛矯；而此「情」之「怨以怒」、「哀以思」相對於「安以樂」的「情性之正」，實為「情性之變」。變者，非常也，人情之所不得已，故為變風、變雅；但「變」而不失其「正」，「真」而不至於「邪」，斯乃先王教化之遺澤。此即〈詩大序〉所謂：「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sup>77</sup>鄭玄〈詩譜序〉更明確坐實國風之〈周南〉、〈召南〉、小雅之〈鹿鳴〉、大雅之〈文王〉之屬，以及成王、周公之頌聲，是為詩之「正經」；而懿王、夷王以下，政教衰亂、周室大壞，其詩為變風、變雅。<sup>78</sup>

從《詩經》具體的編纂觀之，國風的〈周南〉、〈召南〉是「正風」，〈邶風〉以下十三國為「變風」；小雅的〈鹿鳴〉到「菁菁者莪」凡 22 篇為「正

<sup>77</sup>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詩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3年），卷1，頁16-17。

<sup>78</sup> [漢]鄭玄：〈詩譜序〉，收於同上註，頁4-7。

雅」，〈六月〉以下 57 篇為「變雅」。大雅則〈文王〉到〈卷阿〉 18 篇為「正雅」，〈民勞〉以下 12 篇為「變雅」。如此解經，建構「風雅正變」之說，其用意不是在論詩之「體」（「體製」及「體式」），而是在論詩之「用」，用之於「美善」及「刺惡」。所謂「情性之正」、「情性之真」，都是在「內容」與「形式」分離的觀念下，直指詩歌所抒發的內容情志。然而，從「文學」的觀點來看，「文體」必然是內容與形式合一所表現的美感形相，不能只論內容的「情性之正」及「情性之真」。因此，「風雅正變」在原初「詩經學」的語境中，與文學或文學史的論述無關。

降及後世，「風雅正變」大致都是「詩經學」的論題，少有直接套用到一般「詩學」的論述，其中清代汪琬〈唐詩正序〉最具代表性。他先概說「風雅正變」，云：「詩風雅之有正變也，蓋自毛、鄭之學始。……正變之元，以其時，非以其人也。……觀乎詩之正變，而其時之廢興治亂、污隆得喪之數，可得而鑒也。」然後，他就套用「風雅正變」之說，做為閱讀唐詩的基本觀點，云：「吾嘗由是說以讀唐詩。」其閱讀所得乃將唐詩分為四期，貞觀、永徽，即初唐，為「正之始」；開元、天寶，即盛唐，諸詩為「正之盛」，不過這一時期，李、杜已顯露「正矣有變者存」；降而大曆以迄元和、貞元之際，即中唐，乃為「庶幾乎變而不失正者與？」至於這一時期之後，即晚唐，汪琬未做「正／變」的判斷，而僅言：「其辭漸繁，其聲漸細，而唐遂陵夸以底於亡」。重要的是他最後的結論：「凡此，皆時為之也。」<sup>79</sup>將詩風「正變」原因係乎時代之治亂，以及評斷「正為盛」而「變為衰」，其說確是套用「風雅正變」以詮評唐詩。初唐為「正之始」、盛唐為「正之盛」、中唐「變而不失其正」，則襲取明代高棅《唐詩品彙》之見，後文再做討論。

如果，我們在論題發生事實的基礎上，僅就「正變」此一觀念進行第一序總體的詮說，則的確必須區分「風雅正變」與「詩體正變」以論述之。不過，本文論題明確界定在第二序後設性之「正變文學史觀」的重構，則「詩經學」中的「風雅正變」，就必須轉換「詮釋視域」，將《詩經》由「經」的身分轉換為「文學」的身分，回歸「經化」之前的《三百篇》，視為中國

<sup>79</sup> 汪琬為俞無殊、汪家楨、汪森所編《唐詩正》作〈序〉。〔清〕汪琬：〈唐詩正序〉，收於〔清〕汪琬著，李聖華箋校：《汪琬全集箋校》（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頁602-603。

古代「文學史」上，詩歌體源的「始出」之作，又是完善的「正體」。其「體製」為「四言」、「體式」為「雅潤」，即《文心雕龍·明詩》所謂「四言正體，雅潤為本」。風雅或「正」或「變」，都被視為一切韻文原初的「母體」，<sup>80</sup>有時還合「騷」而為「風騷」或「騷雅」，做為後代詩歌之「源」之「正」，乃最高的理想「體式」。特別要注意的是「風雅」或「騷雅」這一「體式」，乃超越漢魏以降「詩之流」的五、七言各次類體相對的不同「體式」之上，而成為涵具理想的文學價值，絕對完善的「體式」。這一「體式」乃絕對的「正」，其特質如何？劉勰《文心雕龍·宗經》所謂「文能宗經，體有六義」，總合「五經」而論，如就「詩」而言「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風雅」當然包涵在其中。我們可以藉用來詮釋「風雅」之「正」的特質，就是「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sup>81</sup>從題材主題內容的情志事義，到語言形式的結構修辭，都中正平和。及至明代許學夷《詩源辯體》因承劉勰此意，而指認「風人之詩既出乎性情之正，而復得於聲氣之和，故其言微婉而敦厚，優柔而不迫，為萬古詩人之經」、「風人之詩，其性情、聲氣、體製、文采、音節，靡不兼善」。<sup>82</sup>至於漢魏以降，「詩之流」的各類體詩，其「體式」之所謂「正」與「變」則相對各有其差別的特質。

因此，在文學或文學史的論述語境中，「風雅」諸作必須轉換詮釋視域，從「詩用」的觀點轉換為「詩體」的觀點，才能詮釋「風雅」在「文學」及「文學史」論述語境中的意義。因此在本論文中，「風雅正變」不再與「詩體正變」區分為二個全不相涉的論述系統，都一概在「詩體正變」的系統中，賦予「風雅」之詩在「文學」及「文學史」的意義。當然對《三百篇》的「風雅」之詩，做出這種詮釋視域的轉換，非自本論文開始。前面述及劉勰在《文心雕龍》所提出的「宗經」，實與荀子、揚雄的「宗經」不同。

<sup>80</sup> 中國古代所稱之「詩」有廣、狹二義，狹義是指與辭、賦、詞、曲等平列的一種文體。廣義則是以《三百篇》為超越各體的最高範式，而做為一切韻文之所從出，具有根源、基型之義，可稱為「母體」。此「母體」有三義：一是一切韻文形式體製之「正典基型」；二是一切韻文美感形相的「正典體式」；三是一切韻文內容情志的「正典價值」。此說參見顏昆陽：〈宋代「以詩為詞」現象及其在中國文學史論上的意義〉，《詮釋的多向視域——中國古典美學與文學批評系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6年），頁319。

<sup>81</sup> 〔南朝梁〕劉勰著，周振甫注釋：《文心雕龍注釋》，頁32。

<sup>82</sup> 〔明〕許學夷著，杜維沫校點：《詩源辯體》，卷1，頁2、6。

荀、揚之「宗經」是為了「政教道德實踐」；<sup>83</sup>劉勰則轉換了荀、揚的詮釋視域，將「五經」看作最完善的理想「體式」，可做為後代士人文章創作的學習典範。前文引到「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之論，其中「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詩」就是《三百篇》，諸作乃是包括「賦頌歌讚」，一切韻文之「本」，也就是「母體」。劉勰之外，上引葉燮《原詩》結合源流、正變、盛衰之論，雖然將「風雅正變」與「詩體正變」對舉，一為「以時言詩」，一為「以詩言時」，並且未曾明白的提出上述所謂「詮釋視域的轉換」；不過他將「變而不失其正」的「風雅」之作，納為「有盛無衰」的「詩之源」，而與後世的「詩體正變」置入同一「源流」的系統中，進行正變、盛衰的論述，以「風雅」為「詩之源」，而視漢魏以下之詩為「詩之流」，互為正變、盛衰。從邏輯法則而言，葉燮將「風雅」做為「詩之源」，而漢魏以下的「詩體正變」做為「詩之流」，則其前提必須設定「風雅」之作，不管是「正」或「變」，都必須是一種「詩體」；也就是「風雅」之詩，乃是以「四言」為「體製」所表現出來的二種「體式」，是為中國古代詩體之「源」。除了劉勰、葉燮之外，歷代諸多詩論，「風雅正變」一旦被納入「文學」的詮釋視域，都是被當作「詩之源」而尊奉為詩歌最為完善的理想「體式」，已非「詩經學」之「以詩觀時」的本義。

## 2. 「正」與「變」的時序關係如何？「變」有其規律嗎？

接著，我們要問「正」與「變」的時序關係如何？「變」有其規律嗎？這二個具有邏輯程序的問題，也必須合著回答。

上文指出「文學史」的認知，必須掌握繁多作品所內具的某些相對「普遍性」及「規律性」。「普遍性」已論述如上，接著我們要問的是：繁多作品有何「規律性」可以讓我們掌握？「規律」必然隱涵於「變化」的歷程中；如果僅將「正變」視為二種相對的「體製」及「體式」，就只是「並時性」的概念，其「歷時性」似乎不夠明顯。因此，我們必須再進一步詮釋正變的「歷時性」，而這「歷時性」是否具有「規律」？從「體製」與「體式」而言，前文已分析「正」除了「完備」及「完善」之義外，又有時序「初始」的「初備」之義；而「變」相對則有「演化」之義。

<sup>83</sup> 戰國荀子與漢代揚雄之因為「道德實踐」而宗經，詳見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卷（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第2篇，第1章，第3節，頁27-28；第3篇，第3章，第2節，頁58-60。

那麼，我們要問的是：「正」有「初始」之義，假如落實於「體製」及「體式」，則「初始」之「體製」是「初備」還是「完備」？而「體式」是「雛貌」還是「完善」？這個問題，從論述而言，各家之說有其差異。從歷史實存的各類體而言，也彼此有其分別。先說「體製」，不管是各家論述或歷史實存，「四言古體」以《三百篇》為「正」，其「體製」既是「初備」也是「完備」，《漢書·韋賢傳》記載韋孟〈諷諫詩〉為第一首文人創作的「四言古體」；<sup>84</sup>故《文心雕龍·明詩》云：「漢初四言，韋孟首唱。」<sup>85</sup>自此以降，詩人所作的「四言古體」，其「體製」都完全一樣，沒有流變。因此「四言」的體製，《三百篇》既是「初備」又是「完備」。「五言古體」則難有唯一的定論，若全篇以「五言」句為主而雜入長短句，西漢就有這類作品，都是樂府，例如《漢書·外戚傳》記載〈戚夫人歌〉、<sup>86</sup>李延年〈佳人歌〉；<sup>87</sup>不過以這類詩為「始出」之作，其體製只能說是「初備」而已。若求全篇都是整齊的「五言」，則《文選》所載李陵與蘇武贈答諸詩，即使被疑為偽作；<sup>88</sup>然而至於班固〈詠史〉則可以肯定是「五言古體」的「初備」又是「完備」之作。<sup>89</sup>而「賦體」，若以荀賦為「初始」，則其體製僅能說是「初備」；至司馬相如〈子虛〉、〈上林〉，始可謂「完備」。近體律絕，六朝的新體詩只是「初備」的體製，流變到初、盛唐之際，始可謂「完備」。其後的詞、曲，甚至小說，莫不如此；故大致而言，除了以《三百篇》為範

<sup>84</sup> 漢代韋孟諷諫楚元王之孫戊的四言古體，參見〔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第2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年），卷73，頁1377。

<sup>85</sup> 〔南朝梁〕劉勰著，周振甫注釋：《文心雕龍注釋》，頁83。

<sup>86</sup> 〈戚夫人歌〉：「子為王，母為虜。終日春薄暮，相與死為伍。相離三千里，當誰始告汝。」參見〔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第2冊，卷97，頁1679。

<sup>87</sup> 〔漢〕李延年〈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參見同上註，頁1683。

<sup>88</sup>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29，「雜詩上」，頁412-413，載有李陵〈與蘇武〉3首，蘇武也有詩4首。後人早疑為偽作，例如顏延之〈庭誥〉云：「逮李陵眾作，總雜不類，元是假託，非盡陵製。」劉勰《文心雕龍·明詩》云：「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參見〔南朝宋〕顏延之：〈庭誥〉，收於〔宋〕李昉等編：《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卷586，頁2770；〔南朝梁〕劉勰著，周振甫注釋：《文心雕龍注釋》，頁83。

<sup>89</sup> 鍾嶸〈詩品序〉云：「班固〈詠史〉，質木無文致。」參見〔南朝梁〕鍾嶸著，曹旭箋注：《詩品箋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頁8。按：班固〈詠史〉從未有見疑者。

式的「四言體」之外，其他各體的「初始」之作，都只是「初備」其體而已。這已是文學史的常談，無須贅言。假如「體製」以「完備」為「正」，則「正」就不只是取決於「初始」的時序定點，而是從「初始」到「演化」，歷經一段「漸變」的時序，則「正」與「變」實難斷然切割。因此，明代高棅《唐詩品彙》就在〈總敘〉中，針對唐詩的「體製」論斷「漸變」的時程，云：

有唐三百年詩，眾體皆備矣。故有往體、近體、長短篇、五七言律句、絕句等製，莫不興於始，成於中，流於變，而侈之於終。<sup>90</sup>

這段文本所謂「往體、近體、長短篇、五七言律句、絕句等製」，指的應當是語言形構的體製，不過接續而言「莫不興於始，成於中，流於變，而侈之於終」，則又不僅指「體製」，似乎兼涵「體式」之義。我們可以理解，「體製」與「體式」在抽象概念的層面，固然可以區別；但是，一落實到創作實踐，則兩者絕非截然為二，了無關係。「體式」原本就是「體製」之形式容納情志之內容而一體表現出來的作品美感形象，「體製」改變，「體式」也隨之而變，因此劉勰在《文心雕龍·明詩》中，才會提出「辨體」之說：「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高棅所謂「侈之於終」，如果僅就五言古體、七言古體、五言律絕、七言律絕，這種共遵的「體製」一直相沿到高棅所處的明代，並沒有「侈之於終」的結局。「侈」，毀壞也。如果「體製」落實於「體式」，作品的美感形相乃詩人各有創新變化，行之既久，是有可能窮極而不復創新，難以變化，而「侈之於終」。這個觀念到了後文所將論述晚明許學夷的《詩源辯體》，就明確的斷言「至梁陳而古詩盡亡」、「至唐末而律詩盡敝」，<sup>91</sup>並且斷言「詩至晚唐，其眾體既具，流變已極，學者已無容更變，但各隨其質性而仿之耳」。<sup>92</sup>這個議題後文會做詳論。

上引高棅這段文本，若單就「體製」而論，則前文所述，除了《三百篇》的四言體之外，其他各體確實會有「興於始，成於中，流於變」的演化時序。「興於始」則「初始」時期，體製僅是「初備」；「成於中」，則演

<sup>90</sup> [明]高棅：《唐詩品彙》（臺北：學海出版社，1983年），頁8。

<sup>91</sup> [明]許學夷著，杜維沫校點：《詩源辯體》，卷1，頁1。

<sup>92</sup> [明]許學夷著，杜維沫校點：《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1，頁375。

化到「中段」時期，體製已是「完備」。這一體製「漸變」的時序現象，驗之於唐詩，全符軌跡。代表唐詩當然是「近體」之五七言律絕，這種由六朝初興的體製，只是「初備」而已，而初唐仍沿其緒，是為「興於始」。其後，歷經頗長的演化時序，至盛唐始稱「完備」，是為「成於中」。而等到體製完備，格律定型，就形成共同遵循的「規範」。這時，就開始會出現有原則限制的拗救之體，甚至大幅逸出平仄、對偶規範的「變體」，例如李白的〈夜泊牛渚懷古〉、<sup>93</sup>杜甫的「吳體」。<sup>94</sup>方回編選《瀛奎律髓》更專立「拗字類」，收入杜甫、賈島、黃山谷、陳後山等人的「拗體」，杜甫的「吳體詩」即在其中。<sup>95</sup>這便是「流於變」。

因此，我們必須特別注意，「變」的經驗現象，不能被簡化，它有二個特徵：一是「變」實非「突變」而是「漸變」，落在時序上，有一逐漸演化的動態歷程；二是其「變」有兩種型態：第一種「興於始，成於中」，是從「正」開始，其時序是「順向」的演化，詩體的「形」與「質」沒有根本的改變，卻可分為二個階段，即由第一階段「生」之「初備」，順向發展到第二階段「成」的「完備」。這是高棅所謂從「興於始」到「成於中」，可稱之為「生成」，是事物在時序中一種動態歷程的順向演化。這一順向型態的「變」，雖然高棅沒有使用「變」這一詞彙，其實由「興」到「成」，就已隱涵著動態性的演化歷程。這二個階段，其體之「初備」與「完備」都統合在「正體」之內。至於第二種「流於變」的型態，如以上述李、杜律體之打破格律的規範而論，則是在詩體已「生成」而「完備」之後，才力甚大的詩人針對定型之體所為創新「破格」之作，乃是「轉向」甚至「逆向」之「變」，這就是高棅所謂「流於變」，可稱之為「變革」，是事物在時

<sup>93</sup> 唐代李白五律〈夜泊牛渚懷古〉一詩，嚴羽《滄浪詩話》評云：「律詩有徹首尾不對者，盛唐諸公有此體，如孟浩然『挂席東南望』、『水國無邊際』之篇；又太白『牛渚西江夜』之篇，皆文從字順，音韻鏗鏘，八句皆無對偶。」參見〔宋〕嚴羽著，張健校箋：《滄浪詩話校箋·詩體》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331。

<sup>94</sup> 唐代杜甫七律〈愁〉，原注「強戲為吳體」。清代黃生注云：「皮陸集中，亦有吳體詩，大體即拗律詩耳，乃知當時吳中俚俗為此體，詩流不屑效之，獨杜公篇什既眾，時出變調。凡集中拗律，皆屬此體。偶發例於此，曰戲者，明其非正聲。」參見〔清〕黃生：《杜工部詩說》（京都：中文出版社，1976年），卷9，頁544。按：杜甫七律159首，這類「吳體」就有19首，不止句中拗救一字，變化幾無定格。

<sup>95</sup> 〔元〕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中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1107-1127。杜甫五七言「吳體詩」入選8首。

序中一種動態歷程的轉向或逆向的改變，與前一時期的詩體相較，其「形」與「質」已出現某種程度的差異，故與「正體」相對而稱為「變體」。假如一種體製發展到轉向、逆向之「變」，而「變革」到窮極，甚至越界而化成另一種異形殊質的文體，例如古人所認知「詩變而為詞，詞變而為曲」，不管「形」或「質」都已是全新之「體」了，這或許就是高棅所謂「侈之於終」吧！此一「正變」觀念，隱然將詩體看作如同一個人由生、長到衰、亡的生命歷程。

上述二種「變」義，一般所關注的常是第二種「變革」之變，而忽略第一種「生成」之變。其實任何文體一旦起源創生，就不可能靜止不變，而是一直處在動態性變化的歷程中。只是有著或順向或轉向或逆向的差別而已。上述高棅的論述，其實隱涵著二種「變」義，就在這時序觀念之下，他所提出的「四唐」之說，因承宋代嚴羽《滄浪詩話》三分「盛唐之詩」、「大曆以還之詩」、「晚唐之詩」，<sup>96</sup>以至元代楊士弘《唐音》三分初盛唐、中唐、晚唐以及始音、正音、遺響的「三唐」架構；<sup>97</sup>甚且楊士弘「審其音律之正變，而擇其精粹」的選詩原則，<sup>98</sup>他也繼承了。就在這基礎上，再進一步將初唐、盛唐分開，而以初唐為「正始」，就是楊士弘所稱的「始音」；盛唐為「正宗」，就是楊士弘所稱的「正音」。初、盛唐可對應上述從「興於始」到「成於中」的二個演化生成的階段。「始」雖然僅為體製之「初備」及體式之「雛貌」，卻是「正體」，只是還不足以為「宗」；「宗」則是體製之「完備」及體式之「完善」，故可以為「宗」矣，並可以為後世所效法。中唐代宗大曆、德宗貞元是盛唐正宗的延續，仍在「正體」的範圍之內，是為「接武」。降及憲宗元和之際，韓、孟則已入「流於變」，高棅視為晚唐第一階段之「變」，卻仍不失其正，故稱為「正變」。至於文宗開成以後，白居易、李賀、杜牧、溫庭筠、李商隱、許渾、馬戴等，則是晚唐第二階段之「變」，已是「變態之極」，「正體」至此，只能說是「遺風餘韻，猶有存者焉」而已，稱為「餘響」；大概瀕臨「侈之於終」了。<sup>99</sup>前文述及汪琬

<sup>96</sup> [宋]嚴羽著，張健校箋：《滄浪詩話校箋·詩辨》上冊，頁7。。

<sup>97</sup> 初盛唐、中唐、晚唐以及始音、正音、遺響三分之名目，參見〔元〕楊士弘：《唐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自序」、「凡例」。

<sup>98</sup> 同上註，「自序」。

<sup>99</sup> 高棅所述正始、正宗、接武、正變、餘響，參見〔明〕高棅：〈總敘〉、〈敘目〉，《唐詩品彙》，頁8-10、46-53。〈總敘〉中，「四唐」時序斷限所提及的詩人，與〈敘目〉中，分

〈唐詩正序〉所論唐詩四期的正變，雖引述「風雅正變」之說，但分期的架構則顯然因襲楊士弘、高棅的說法。

高棅此說所隱涵的評價之意，姑且不論。他的論述最值得注意的是，由「正」而「變」之「漸進」的動態時間歷程。其論述所涵的「變」義有二：一是詩體演化歷程的「描述義」，只是描述事實、現象而已，不涵評價之義；二是與「正」為對的一種詩體之義，雖不離「體製」，但側重面還是在詩人表現完成之作品的美感形相，即「體式」的「變體」之義。這一義就不僅「描述」而已，更涵有「評價」，後文再做詳說。

高棅所論是唐詩的斷代史，比較單純，「正變」顯然是「單一線性」的時序關係，「正」在先而「變」在後，循著一線向前演化，沒有反復辯證的規律。

### 3. 「正變」與「源流」縮合而論

古代詩論家多將「正變」觀念與「源流」觀念縮合而論，以「源」為「初始」、為「正」；而「流」為「演化」、為「變」。上引葉燮《原詩》所說「夫風雅之有正有變」云云，就是將「源流」與「正變」縮合而論。這種縮合「源流」與「正變」的論述，最具代表性者，葉燮之外，當推晚明的許學夷，後文將詳做論述。

葉燮稍晚於許學夷，他的「源流正變」之說，前文已略述及，在論及許學夷之前，這裡再做詳論。相對高棅而言，葉燮所論為通代詩史，就比較複雜，其「源流正變」的時序可分為二系：第一系視「風雅」為「詩之源」，而漢魏以下直到明代則為「詩之流」；故「源流」乃總合「風雅」以至歷代各體詩之起源、流變的時序關係而言。若將「源流」與「正變」合論，則「風雅」做為「詩之源」，其「源」之義，既是歷史時序之「初始」，也是詩體之「正宗」。在「風雅正變」的語境中，雖有正風、正雅與變風、變雅之別，那是「時有變而詩因之」；但是，葉燮認為「時變而失正，詩變而仍不失其正」。這當然是因承〈詩大序〉之說，因為「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是「情之真」，「止乎禮義」是「情之正」；故就詩論詩乃是「詩變而仍不失其正」，則風雅之或正或變，都可統合為「詩之源」與「詩之正宗」，相對於其後歷代各詩體的流變，只具「正」之義，而不具「變」

---

類品項編入的詩人略有出入。例如〈總敘〉以「時」分，柳宗元在元和之際的晚唐第一階段；〈敘目〉以「體」分，柳宗元被視為「超然復古」，故編入接近「正宗」之「名家」。

之義。這一層次的「源」與「流」，其先後時序及規律看似單一線性的演化關係。

第二系則是「風雅」以下，漢魏以迄明代的「詩之流」，各代都相對有「正」有「變」。同時他又將「源流」、「正變」結合「本末」、「盛衰」構成系統化的論述。葉燮曾指責在他之前的「稱詩之人，才短力弱，識又矇焉而不知所衷」，故「不能知詩之源流、本末、正變、盛衰，互為循環」。<sup>100</sup>其中關鍵性的觀念就是「互為循環」，也就是「風雅」以下，歷代各詩體的源一流、本一末、正一變、盛一衰，這一層次的詩體已多元分流，故其先後時序都不是單一線性的演變關係，而是「互為循環」。他這個觀點有其針對性，大致是批判明代李夢陽、李攀龍等被認為「復古」的詩人，反對他們「申正而詘變」。因此，他指出《三百篇》之後，漢魏以下的「詩之流」，「循其源流升降，不得謂正為源而長盛，變為流而始衰；惟正有漸衰，故變能啟盛」。<sup>101</sup>那麼，相對於風雅之源之正，建安是流是變；但是，當它流變而生成「新」的詩體，則又樹立另一個不同於風雅之源之正；此一新的源、新的正，固然是「盛」，相沿既久，必然會流變至於「衰」，故葉燮云：「建安之詩，正矣，盛矣；相沿久而流於衰。」既衰，則必由「後之力大者大變，力小者小變」，才能重啟盛況。在他來看，「六朝詩人，間能小變，而不能獨開生面」，當然無法再生成「新」的詩體，以樹立另一個不同於建安之源之正；而至於初唐沿習六朝，乃「詩之極衰」。這必須「迨開、寶諸詩人，始一大變」，<sup>102</sup>故詩至盛唐，實建安之源之正相沿至於極衰，才大之詩人如李、杜者，乃「大變」而生成「新」詩體，以樹立另一個不同於建安之源之正。如此，源流、正變、盛衰，相互循環，彼此辯證。建安詩體相對是「風雅」之流之變，卻又相對是六朝、唐代詩體之源之正。其關鍵就在於「變」，而且必須是「大變」，始能「因承」先前之源之流之盛，由於相沿而至於衰，才大者乃「創變」新的詩體，而另立其源其正其盛。

然則，若問詩體之「變」有其規律嗎？至此可以回答：詩體的變遷，就是循著這種「源流、正變、盛衰，相互循環」的規律在推進。然則，可

<sup>100</sup> [清]葉燮著，霍松林校注：《原詩》，「內篇上」，頁3。

<sup>101</sup> 同上註，頁8。

<sup>102</sup> 同上註。

見葉燮的「源流正變」論述，不僅在詮釋文學的流變史，同時涵著「創作論」的意義。文學歷史本就是在「創作實踐」的事實所構成。在葉燮的論述中，文學的歷史經驗，「流」必出於「源」，而相對「源」必生「流」，源流相生；詩人「創作」的正確史觀及實踐，不能偏執一端，故云：「執其源而遺其流者，固已非矣；得其流而棄其源者，又非之非者乎。」對於「正變」，也必「因正」而「創變」；「創變」而新立可「因」之「正」，以啟後世之「變」，如此正變、因創相循不斷；故而葉燮認為蘇武、李陵「始創五言」以及古詩十九首，乃「因乎《三百篇》」；建安、黃初之詩乃「因於蘇、李與十九首」，卻「因而實為創，此變之始也」，<sup>103</sup>以下由西晉變遷到盛唐諸詩人。這種正變文學史觀所導向的文學史型態，明白是以創作實踐之「因創」為動力而不斷循環推進的「有機性文學史」。

準此，若問「正」與「變」的時序關係？答案顯見不必然「正」在先而「變」在後，乃互為先後。這就是葉燮所說的「詩體正變」，若問「詩體」是什麼？葉燮的說法是「體格、聲調、命意、措辭」。對這些名稱，他沒有定義，不過我們揣摩其意，「體格」、「聲調」大致是語言形構的「體製」，而「命意」、「措辭」則是已實際創作而表現為作品，應該指的是「體式」。

晚明許學夷比葉燮略早，他作《詩源辯體》，開宗明義就確指「言詩」必須「審其源流，識其正變」，云：

詩自《三百篇》以迄於唐，其源流可尋而正變可考也。學者審其源流，識其正變，始可與言詩矣。<sup>104</sup>

他將這一原則實踐於歷代詩歌的論述，「統而論之」是：

《三百篇》為源，漢、魏、六朝、唐人為流，至元和而其派各出。<sup>105</sup>

接著「析而論之」則是：

<sup>103</sup> [清]葉燮著，霍松林校注：《原詩》，「內篇下」，頁35。

<sup>104</sup> [明]許學夷著，杜維沫校點：《詩源辯體》，卷1，頁1。

<sup>105</sup> 同上註。

古詩以漢魏為正，太康、元嘉、永明為變，至梁陳而古詩盡亡。  
律詩以初、盛唐為正，大歷、元和、開成為變，至唐末而律詩盡  
敝。<sup>106</sup>

在許學夷的論述中，詩之源流、正變的時序關係，與葉燮同樣分為二系：第一系「統而論之」是針對總體詩歌的「時序」關係，而以「源流」表述，不分古、近體，以《三百篇》為源，而漢魏以下至唐代皆為「流」，這顯然是單一線性的「時序」。他比較特殊的論述是詩歌從「源」到「流」，降至中唐元和時期，又「其派各出」；則「單一線性」的「源流時序」到此開始出現「多元線性」的「流派時序」。「其派各出」，當然是「分化演變」。這應該與元和之後，詩人社群的分化及其詩觀的歧異有關，例如以元、白為中心的次社群與韓、孟、賈為中心的次社群，詩觀的歧異明顯，遂分化為不同的「體式」，故許學夷論及大歷以後，五七言古、律之詩，流於委靡，故韓愈、孟郊、賈島，以及白居易、元稹諸詩人「群起而力振之」，卻「惡同喜異，其派各出」。<sup>107</sup>於是詩人社群的分化及其詩觀的歧異，遂造成「流」又分「派」，詩體走向「多元線性」的分化演變。

第二系「析而論之」乃「分體」而論，以「正變」表述不同詩體的時序關係。這一點與葉燮不同，葉燮只總合古、近各體，區分「時期」及代表性詩人而論，卻不「分體」；許學夷則「分體」而論，大致分為「古詩」與「律詩」，而各有正變盛衰的時序、軌跡，就是前引所謂「古詩以漢魏為正……至梁陳而古詩盡亡；律詩以初、盛唐為正……至唐末而律詩盡敝」云云。這正是高棅所謂「侈之於終」，詩體變至窮極，會衰敝死亡。他再往下「析而論之」，則非常複雜，「五言」從漢代蘇、李的古詩到初唐沈、宋的律詩，雜合語言形構、修辭與聲律而論，歷經「七變」。律詩則從初唐沈佺期、宋之問、杜審言到晚唐杜牧，雜合語言修辭、氣味、聲韻而論，歷經「九變」。他認為：「詩至晚唐，其眾體既具，流變已極，學者已無容更變，但各隨其質性而仿之耳。」<sup>108</sup>晚唐之後，宋、元、明三代詩體已難創新，只能隨個人質性之異而選擇漢魏至唐代的體式去學習。<sup>109</sup>如果僅從許

<sup>106</sup> [明]許學夷著，杜維沫校點：《詩源辨體》，卷1，頁1。

<sup>107</sup> 同上註，卷24，頁248。

<sup>108</sup> [明]許學夷著，杜維沫校點：《詩源辨體·後集纂要》，卷1，頁375。

<sup>109</sup> 許學夷之分體析論歷代詩風正變，所謂「七變」、「九變」，詳參謝明陽：《許學夷《詩源

學夷對古代詩史的論述觀之，則「正變」的時序關係，必是「正」在先而「變」在後，其規律也就是由「正」而「變」，前段為「單一線性」，中段則開始「多元線性」的分化演變。

然而，他的論述其中隱涵一個可能的轉折，必須特別注意：既然古詩至梁陳而盡亡，律詩至唐末而盡敝，宋、元則幾乎從詩史消失，那麼降及他所處的明代，又該如何繼續詩的創作？其關鍵就在於他的「詩史論」必須整合「詩創作論」，而從許學夷整體詩學系統去理解。他所謂「古詩至梁陳而盡亡，律詩至唐末而盡敝」，是對過去詩史的反思批判，其真正的論述意圖，不僅在於建構古代詩史的客觀知識，如同我們現在書寫一部《中國文學史》；他真正的意圖是由「詩史論」推演「創作論」，提出立場明定的主張：如何接續、重構漢魏、盛唐的詩體本質，而經由當代詩人的實踐，以為詩的創作救亡解敝，重建「未來」理想的詩體。這種論述當然關聯到許學夷所身處明代的歷史情境，格調與公安對立，宗唐與祧宋論爭。其詳情，後文再做論述。在此，先提出關鍵的基本觀念，我們必須了解中國古代的文學論述，文學本質論與功能論、文體源流論（文學史論）、創作論都彼此關聯為一家之言的總體觀念系統。

在許學夷的論述中，詩體析而論之，其「變」即是如此。那麼我們要問的是什麼在「分化演變」？前文已論明，文學史上的「變」就是「體製」與「體式」二個層面的變；只是許學夷將二者雜合而論，其實「體製」是共同遵行的常態形構，其「變」大體是「趨同」與「漸進」，非個人所能完全主導，因此極少分歧。古、近體及四、五、七言體到盛唐已經「完備」，其後沒有再「變」；如說再變，就已跨越到詞、曲，那是另類文體之變，不在狹義的「詩學」之內。因此，以「源流」統而論之，至中唐元和「其派各出」，所「變」者當是「體式」，也就是表現完成之作品的美感形相。

許學夷、葉燮之論源流、正變，都只針對詩體而言，不跨越其他類體。晚清陳廷焯之詞論，也是結合源流、正變，構成論述系統，可為代表。他的「源流正變」之論，可分為彼此相關的二系：一系是詞體本身的源流、正變，另一系是跨體連結到古樂府及風騷的源流、正變。《白雨齋詞話》云：

十三國變風，二十五篇《楚辭》，忠厚之至，亦沉鬱之至，詞之源也。<sup>110</sup>

詞也者，樂府之變調。風、騷之流派也。溫、韋發其端，兩宋名賢暢其緒。風、雅正宗，於斯不墜。<sup>111</sup>

自溫、韋以迄玉田，詞之正也，亦詞之古也。元、明而後，詞之變也。茗柯、蒿庵，其復古者也。<sup>112</sup>

陳廷焯所謂「自溫、韋以迄玉田」，乃是「詞之正、詞之古」，至於「元、明而後」，則為「詞之變」。這一系是詞體本身的正變。「自溫、韋以迄玉田」，包涵晚唐五代以至兩宋，這是詞的「原初」時期，故謂之「詞之古」；同時又是詞體的「正宗」，故謂之「詞之正」。至於元、明之後，則是「詞之變」。陳廷焯宏觀詞史，以古代為「正」，而近世為「變」；並且遵循常州詞派創始人張惠言之洄溯詞源於風騷，<sup>113</sup>故上引《白雨齋詞話》指認「茗柯」、「蒿庵」為「復古」；「茗柯」就是張惠言，「蒿庵」則是莊棫，被歸為常派詞人。陳廷焯的詞本質觀與詞史觀，顯然認同常派的「復古」；在他來看，詞不但本身有其「源流正變」，還必須跨體連結到更「古」的樂府、風騷，以追溯其「源」其「正」，故而以詞為樂府之「變」，相對而言，樂府為「正」；詞又是風騷之「流」，則風騷為「源」，因此他又說：「十三國變風，二十五篇《楚辭》，忠厚之至，亦沉鬱之至，詞之源也。」而風雅不管是「正」或「變」，總體而言，相對於詞，都是「正宗」。這一系是跨體的「源流正變」。

第二系跨體的「源流正變」之論，值得特別關注。這種論述不僅是在詮釋已成過去的詞史，更是為詞體溯源返本，重新定義詞的本質，以做為「創作」的準則，期待未來創造理想的詞體，而開拓詞體未來的新歷史階段。這是結合詞體起源、本質、創作、詞史的論述。一切韻文的歷史時序，過去、現在、未來的三維時間連綿不斷，跨越詩、騷、賦、詞、曲等次類體，而被建構成以「風雅」為源為正，為基型「母體」的大傳統。

<sup>110</sup> [清] 陳廷焯著，屈興國校注：《白雨齋詞話足本校注》下冊，卷1，頁9。

<sup>111</sup> 同上註，卷7，頁538。

<sup>112</sup> 同上註，卷9，頁695。

<sup>113</sup> 張惠言在《詞選序》中，為詞溯源於風騷，參見[清]張惠言、董毅編，李次九校讀：《詞選續詞選校讀》上冊（臺北：復興書局，1971年），卷1，頁5-7。

這種「源流正變」的觀念當然不是始自陳廷焯，而早從漢代就已產生。我在〈中國古代原生性「源流文學史觀」詮釋模型之重構初論〉一文中，就已提出一種「文體價值本末關係」的詮釋模型；這種詮釋模型乃從文體的源流，溯末以尋本，從而規定此一文體存在的價值性依據，再建構出創化、開展的實踐規範，這是對「未來」之文學歷史的導向與創造。<sup>114</sup>漢代的辭賦學，淮南王劉安敘《離騷傳》，雖未明確以「源流正變」論述〈離騷〉與《三百篇》的關係，卻隱涵其義的認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sup>115</sup>王逸作〈離騷經序〉，則明指「〈離騷〉之文，依詩取興」；<sup>116</sup>至於劉勰更是直接比對屈騷與儒家經典，在〈辨騷〉中指認「四事同於風雅」、「四事異乎經典」，而在〈序志〉中斷言「體乎經」、「變乎騷」；<sup>117</sup>其意可理解是以「經」為「源」為「正」，而「騷」為「流」為「變」。至於漢代新興的大賦，班固也明白指認「賦者，古詩之流也」。<sup>118</sup>「風雅」為「源」為「正」，而「辭賦」為「流」為「變」，至此成為定說，後世相沿不斷，例如蘇軾云：「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sup>119</sup>徐師曾云：「按《楚辭》者，詩之變也。」<sup>120</sup>姚鼐云：「辭賦類者，風雅之變體也。」<sup>121</sup>這種跨體的「源流正變」之論，再擴展下去，則一切韻文體都可串聯為同一譜系，例如沈德潛云：「張衡〈四愁詩〉，心

<sup>114</sup> 顏崑陽：〈中國古代原生性「源流文學史觀」詮釋模型之重構初論〉，頁 256。

<sup>115</sup> 此語參見〔漢〕司馬遷：《史記·屈原傳》第 2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 年），卷 84，頁 1004。〔漢〕班固〈離騷序〉引用此語，並標明為「淮南王安敘《離騷傳》」，參見〔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卷 25，頁 611。劉勰《文心雕龍·辨騷》也同樣指明為淮南王《離騷傳》之語，參見〔南朝梁〕劉勰著，周振甫注釋：《文心雕龍注釋》，頁 63。

<sup>116</sup> 參見〔漢〕王逸注，〔宋〕洪興祖補注：《楚辭補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 年），卷 1，頁 12。

<sup>117</sup> 「四事同於風雅」、「四事異乎經典」二語，參見〔南朝梁〕劉勰著，周振甫注釋：《文心雕龍注釋》，頁 64；「體乎經」、「變乎騷」，參見〔南朝梁〕劉勰著，周振甫注釋：《文心雕龍注釋》，頁 916。

<sup>118</sup> 〔漢〕班固：〈兩都賦序〉，收於〔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 1，頁 21。

<sup>119</sup> 〔宋〕蘇軾：〈答謝民師書〉，《蘇東坡全集·後集》（臺北：河洛圖書，1975 年），卷 14，頁 621。

<sup>120</sup> 〔明〕徐師曾：《文體明辨》第 1 冊（京都：中文出版社，1988 年），卷 1，頁 175。

<sup>121</sup> 〔清〕姚鼐編，王文濡校注：〈序目〉，《古文辭類纂評注》第 1 冊（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9 年），頁 13。

煩紆鬱，低徊情深，風騷之變格也。」<sup>122</sup>吳訥云：「四六為古文之變，律詩為古賦之變，律詩雜體為古詩之變，詞曲為古樂府之變。」<sup>123</sup>這一類論述都是從文體的源流正變，溯末以尋本，因而規定此文體存在的價值必以「經」為依據，並建構出創化、開展的文體規範，而付諸實踐；這是對「未來」之文學歷史的導向與創造。陳廷焯固然如此，許學夷也如此，他既以《三百篇》為「源」為「正」，故論創作即以風雅之詩為價值之所本，云：「風人之詩既出乎性情之正，而復得於聲氣之和，故其言微婉而敦厚，優柔而不迫，為萬古詩人之經。」這是他反思批判古代詩史，而面對他所處的當代，從創作論提出救亡解蔽的主張，以期「再創」未來新變的詩歌歷史。這種文學的本質與功能、文體源流、創作與批評結合為一個系統的論述，具有創造未來文學歷史的效用。而且，「創作論」才是這一觀念系統的核心，其他的論述都為了支持「創作實踐」的正當性。因此，其中所論及的文學史，都是「創作實踐」歷程中，站在「現代」而承接「古代」，並指向「未來」，還在持續動變的「有機性文學史」。

我們必須特別注意的是，這種歸源返正的「源流正變」觀，一向被認為「復古」。其實，「復古」一詞甚為不當，「復」有返回之義，容易被誤解為在單一線性的「時序」上，返回古代，模仿古人之文，因此而失其「因時創變」的新義；則「宗古」或「學古」一詞或較適當，「宗古」或「學古」者乃宗法古代經典之文學根本精神及其創作原理，此為學習歷程及方法，而其終極目的則意在「因時創變」，也就是體悟經典的根本精神及創作原理，而取材於當代的存在經驗及秉持當代的價值觀，並融入個人的性情才思，以「再創」新變的體式。這一創變的新體式既涵有經典所建構的「正」，又涵有因時再創的「變」；「正」與「變」非截然為二，而融為一體。

準此，若問「正」與「變」的時序關係如何？「變」有其規律嗎？這種「源流正變」的「時序」，也不必然「正」在「先」而「變」在「後」；經由既「宗古」又「因時創變」的實踐，開展「未來」的新變文體；則在過去、現在、未來，時間三維綿延不斷的文學史時序歷程中，「現代」之「今變」當下已是先在，而後涵融「古代」之「昔正」，轉化入於「正變交融」

<sup>122</sup> [清]沈德潛：《古詩源》（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7年），卷2，頁11。

<sup>123</sup> [明]吳訥著，于北山校點：〈凡例〉，《文章辨體序說》（香港：太平書局，1977年），頁10。

之新體；此新體固非古代之「昔正」，也非現代前一時段之「今變」，而是向「未來」繼續發展的「正而變」、「變而正」的新體。每一新體的實現，都是「變中有正」而「正中有變」；「正」與「變」在綿延的文學史時序歷程中，經由不斷的創作實踐而彼此辯證交融推進，直到創作實踐完全停止，才正、變俱滅，所謂「文學史」也就銷亡而不復存在了。這就是「變」的規律。其間，最為關鍵就是「創作實踐」，文學史最大的功用，就是做為「創作實踐」參照的鏡鑑，是與詩人生命存在經驗及價值密切關聯的「效果歷史」，<sup>124</sup>而不是純為學術知識的客體。此理，現代學者已少有理解者。

#### 4. 詩體之所以「變」的原因、條件是什麼？詩體的「正」與「變」是否涵具價值性？

最後，我們要問的是：詩體之所以「變」的原因、條件是什麼？詩體的「正」與「變」是否涵具價值性？

詩體之所以「變」的原因、條件是什麼？這個問題基本的答案有三種：其一是「時代」政教之治亂與風俗之厚薄，起於〈詩大序〉及鄭玄〈詩譜序〉，前文已做論述。劉勰因承而概括其意，《文心雕龍·時序》云：「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sup>125</sup>故「變因」在於「時」。至於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云：「習玩為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sup>126</sup>這段論述包涵消極而客觀與積極而主觀的二種「變因」，可先分開而論。詩體所以「變」的原因、條件，其二是一種文體流行既久，其「體製」的表現功能已不足應付新的題材。而表現效果的「體式」也已凡舊而缺乏新貌，故不得不變，這是消極的外在客觀條件，其「變因」在於「文體」自身的新陳代謝；其三則是才高的詩人，或許才性所具的創造力，因應新題材而自然創造新變的「體製」，例如屈原之創造騷體、司馬相如之創造賦體。或許是針對凡舊的「體式」而立意求變，例如韓愈對文章之「體式」，改變八代駢儷之「綺靡」而創為載道古文之「雄健」；張惠言

<sup>124</sup> 「效果歷史」(wirkungsgeschichte) 指的是：一切歷史現象或流傳下來的作品都不能當作只是純為歷史研究的客體，而應當注意到它在人們歷史性的存在以及意義的理解過程中所產生的影響效果。參見〔德〕漢斯－格奧爾格·加達默爾著，洪漢鼎譯：《詮釋學 I：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頁 393-401。

<sup>125</sup> 〔南朝梁〕劉勰著，周振甫注釋：《文心雕龍注釋》，頁 816。

<sup>126</sup> 〔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 年），卷 52，頁 420。

對詞的「體式」，改變應歌賄酒的「豔情體」而創為賢人君子言外寄託的「比興體」，則其「變因」在於「人」。

「體」為何而「變」？所涉因素條件非常複雜，文論家各有不同側重的層面。以上列三種「變因」觀之，第一種「變因」在於「時」，可以前文所舉汪琬〈唐詩正序〉為範例，他先直接斷言：「正變之元，以其時，非以其人也。」然後歷敘貞觀、永徽諸詩為「正之始」；開元、天寶諸詩為「正之盛」，此時李、杜已表現「正矣有變者存」；至於元和、貞元則為「變而不失正者」。而關鍵就在於他認為，這四個時期或「正」或「變」之所以生成，其因「皆時為之」；接著他又進一層從唐代各時期政教之「治亂」，以印證詩體之「正變」，而結論是「正變之所形，國家之治亂繫焉；人才之消長，風俗之隆污繫焉」。<sup>127</sup>這明顯是「時代決定論」的觀點。汪琬之外，明清時期頗有秉持此說者，例如王世貞、胡應麟都有「文章關氣運」、「文章關世運」之論，甚至推向「天地間陰陽剝復之妙」的神祕之說。<sup>128</sup>許學夷對詩體之「變因」所論最為複雜，客觀的「理勢之自然」、「國運之治亂」，主觀的「詩人立意創變新體」及「才能之作用」都有，<sup>129</sup>其中所論及：「治亂之不同，亦文運之一變也。」<sup>130</sup>大體與汪琬同一論調。

第二種「變因」在於「文體」自身的新陳代謝，許學夷以「理勢之自然」做為客觀性的基本軌則，故屢云「詩至元嘉而古體盡亡也。此理勢之自然，無足為怪」、<sup>131</sup>「七言律之興，實自杜、沈、宋三公始，故未能純美耳。此理勢之自然，無足為異」、<sup>132</sup>「盛世尚同，衰世尚異，亦理勢之自然耳」。<sup>133</sup>他所謂「理勢」，析而言之乃是「理之必至，勢之必然」，指的是詩體的演變有一不能不變的理則與趨勢，而成為一種客觀規律。比許學夷略晚的顧炎武「詩體代降」之說，所謂「勢」，與許學夷所謂「理勢」義頗相近，云：「《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勢也。……詩文之所以

<sup>127</sup> [清]汪琬：〈唐詩正序〉，頁602-603。

<sup>128</sup> 參見陳國球：《胡應麟詩論研究》（香港：華風書局，1986年），頁19-24。

<sup>129</sup> 參見謝明陽：《許學夷〈詩源辨體〉研究》，頁66-74。

<sup>130</sup> [明]許學夷著，杜維沫校點：《詩源辨體》，卷1，頁24。

<sup>131</sup> 同上註，卷7，頁108。

<sup>132</sup> 同上註，卷13，頁148。

<sup>133</sup> 同上註，卷34，頁318。

代變，有不得不變者。」<sup>134</sup>這種客觀性的「理勢」，其實只是描述詩體「不得不變」的客觀必然現象；但是，詩體由「人」所創造，其本身不可能自涵「變的動力」；「變」的自主性動力，必然是詩人各殊的才性，或是詩人社群的分化及其詩觀的歧異。

因此，第三種「變因」在於「人」，才是詩體之所以「變」的關鍵、樞紐。然則，前文所列舉三種主、客觀的「變因」，概念上雖可分而論之；但落實在文學創作實踐及動態性的文體變遷歷程中，則這三種「變因」必交互作用，而以「人」的才性、觀念為內在「主因」，時代治亂與文體新舊只是外在「助因」；「助因」是引觸、支持一種事物生成之內在因果關係的外緣條件，並沒有主動性；說時代治亂、氣運、世運、理勢、勢，都不能充分有效的詮釋文體的「變因」；文體的「變因」，其關鍵必在於「人」。葉燮所側重者，也就是「人」，故特別論述詩人主體的才、膽、識、力，<sup>135</sup>力讚「杜甫之詩，包源流、綜正變」，而「杜之為杜，乃合漢、魏、六朝，並後代千百年之詩人而陶鑄之者乎」。至於「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為鼻祖」。總之，詩人「力大者大變，力小者小變」。而其之所以變，有些是才性自然之發用，葉燮云：「原夫創始作者之人，其興會所至，每無意而出之，即為可法可則。」<sup>136</sup>另者，有一些則如蕭子顯所稱，有見於前代詩體凡舊，遂立意創變新體，以為「代雄」。前文論及許學夷就曾指出：「大歷以後，五七言古、律之詩，流於委靡。元和間，韓愈、孟郊、賈島……白居易、元稹諸公群起而力振之，惡同喜異，其派各出。」<sup>137</sup>這是由詩人社群覺察詩體流於委靡，並提出不同詩觀，立意求變，而創新「體式」。

最後，我們要問的是：文體的「正」與「變」是否涵具價值性？這個問題的答案，可有二系：第一系是未結合論述者特定立場之「創作論」，只是通觀過去的文學歷史，則源與流、正與變、初始與演化整合起來，都只具描述義及詮釋義，而不具評價義。源、正、初始作品，其價值未必高於流、變、演化的作品；反之亦然。其中，「正」之一義是體製「完備」，而

<sup>134</sup> [明] 顧炎武：《原抄本日知錄》（臺南：唯一書業中心，1975年），卷22，頁606。

<sup>135</sup> [清] 葉燮著，霍松林校注：《原詩》，「內篇下」，頁23-29。

<sup>136</sup> 同上註，「內篇上」，頁8。

<sup>137</sup> [明] 許學夷著，杜維沫校點：《詩源辨體》，卷24，頁248。

「變」是體製「破格」，這層「正變」之義，也只具「描述性」及「詮釋性」意義，而不涵「評價性」意義。第二系是已結合論述者特定立場之「創作論」，關聯到面對現代，並指向未來的「創作實踐」，而追問：什麼是詩？什麼是好詩？如何作出好詩？這三個邏輯相關的系列問題，則在「體式」層面，「正」與「變」就有了評價義。而隨著論述者個人所選擇「創作實踐」立場的不同，而有「伸正而詘變」與「伸變而詘正」的評價差異。不過，我們必須要特別注意，古代的詩論家在「伸正而詘變」與「伸變而詘正」上，其實沒有人會取消創作實踐的動態性時序，而僅以靜態性抽象概念選擇絕對不變的立場。前述諸家的論述，以葉燮為例，如果片面從他論述時所站立的「現在」時間來看，似乎是「伸變而詘正」，以「變」為高而「正」為下；然而，我們必須注意到，葉燮這種論述，其實因為反對當時被認為「復古」之流所持「伸正而詘變」的立場，而意圖解其迷蔽。這是一種對治、變革時代詩風之偏蔽的「策略性論述」；他反對「伸正而詘變」，並未兩極對立的固持「伸變而詘正」；而是以「創作實踐」為導向，指出「未來」詩風的創變之路，而認為源流、正變乃循環相生互成的辯證關係，不能偏執一端。相對的，以許學夷、陳廷焯為例，如果片面從他們論述時所站立的「現在」時間來看，似乎是「伸正而詘變」，以「正」為高而「變」為下。我們同樣要注意到，從他們所身處的時代語境，所要對治、變革的詩風之蔽，以及「創作實踐」的導向，看似「伸正而詘變」，也是一種「策略性論述」，並未因此而固持為絕對不變的立場，前面已論明，在他們的觀念與創作實踐中，源流、正變也是相生互成的辯證關係。

#### 四、現代《中國文學史》書寫所導出的史觀問題，可以如此解決，以及未來的展望

經由前文的論述，我們可以先歸結為二個基本的觀念；然後，進行「正變」文學史觀之「詮釋模型」的重構。

- (一) 晚清以降，《中國文學史》浮濫生產，盲目套借西方「進化史觀」、「唯物史觀」。這二種史觀本與中國古代各類體文學的源起、流變毫無血肉、靈魂的關係。近百年來繁多的著作，已顯示這二種舶來外植的史觀，確實缺乏相對客觀的詮釋有效性，有識者應該將它廢棄。而將詮釋視域轉向與中國古代各類體文學之源起、流變共在的「原生性」文學史觀，「正變」是其中之重要者。這種「原生性」文學史觀

本是古代所有文學家「創作實踐」時，內在的歷史意識或觀念，乃是構成文學史的要素之一，始終與各類體文學的源起、流變同體而共在。從這些「原生性」文學史觀，才能貼切而有效的詮釋中國古代文學的歷史。

(二) 中國古代文學家對文學史的論述，都不是僅將「文學史」當作與自己的生命存在經驗、意義以及文學「創作實踐」無關的知識客體在做研究。文學的歷史就是他們生命存在的情境，以及「創作實踐」所身處的場域。每個文學家都是「在場」發言，將文學的本質與功能、文體源流、創作與批評結合為一個系統而論述，具有創造未來文學歷史的效用。而且，「創作論」才是這一觀念系統的核心，其他的論述都為了支持「創作實踐」的正當性。因此，其中所論及的文學史，都是「創作實踐」歷程中，站在現代而承接古代，並指向「未來」，還在持續動變的「有機性文學史」。

接著，綜合前文的分析性詮釋，我們可以將「正變」文學史觀做出重構。其中，高棅那種斷取一代所做「線性」正、變演化現象的描述，同時又沒有連接到創作論，比較缺乏詮釋理論的意義，就不做處理。因此，我們將以葉燮與許學夷、陳廷焯的正變史觀為對象，重構為二種「詮釋模型」：一是「因正創變，迭代循環」的詮釋模型；一是「歸源宗正，因時創變」的詮釋模型。這二種「詮釋模型」都是以「創作實踐」為目的而結合文學史上各類體「源流正變」的二元對立辯證關係，所構成對於「有機性文學史」的詮釋模型。

#### (一)「因正創變，迭代循環」的詮釋模型

這一模型可以葉燮的論述為範式。前文已詳為分析詮釋，可綜合提要如下：葉燮雖以「風雅」為源為正，卻不規定後世之詩必須歸源返正於「風雅」；而認為漢魏以降之詩，相對風雅為「流」為「變」，卻能「因」風雅之源之正，而「創」變不同於風雅的新體，另成可為六朝以下詩體之源之正。流變至盛唐詩而又「因」漢魏之源之正，而「創」變為不同於漢魏詩的新體，另成可為中晚唐以下詩體之源之正。詩體就依此規律，「因正」而「創變」；「創變」而新立可「因」之「正」，以啟後世之「變」。如此「因正而創變」，彼此辯證推演，迭代循環下去。而詩體之所以「變」，其「變

因」乃出於詩人的才膽識力，經由「創作實踐」，不斷以「因創」的動力，而構成「有機性文學史」。

## (二)「歸源宗正，因時創變」的詮釋模型

這一模型可以許學夷、陳廷焯第二系「源流正變」論述，結合「創作論」做為範式。前文已詳為分析詮釋，可綜合提要如下：他們都對流變至當代的詩體，做出「歸源宗正」的要求，因而規定此一詩體存在的價值必以「風雅」為本，並建立創化、開展的理想「體式」規範，而付諸實踐；這是對「未來」之文學歷史的導向與創造。這一模型不能誤解為缺乏創新的「復古」；而應該理解為宗法古代經典之文學根本精神及其創作原理，而其終極目的則意在「因時創變」，也就是體悟經典的根本精神及創作原理，而取材於當代的存在經驗及秉持當代的價值觀，並融入個人的性情才思，以「再創」新變的體式。這一創變的新體式既涵有經典所建構之「正」，又涵有因時再創之「變」；「正」與「變」非截然為二，而融為一體。其中所論及的文學史，都是「創作實踐」歷程中，站在現代而承接古代，並指向「未來」，還在持續動變的「有機性文學史」。

這二種「正變文學史觀」的「詮釋模型」，可資應用於現代《中國文學史》的書寫，以詮釋歷代各類體文學，如何經由歷代文學家所抱持的「正變」文學史觀，選擇「因正創變，迭代循環」或「歸源宗正，因時創變」的觀念，而付諸「創作實踐」，以接續、共同參與「有機性文學史」的建構。

中國古代文學的類體，六朝文人所做的「文筆之辨」，即無韻之「筆」與有韻之「文」；「筆」是無韻的「散文」，「文」是有韻的「詩」，這兩者乃中國文學二大母類體，由此分流演變為眾多的子類體。「詮釋模型」的建構本應取材於主流、普行的母類體，無須也無法一一處理分流演變的子類體。實際上，「正變文學史觀」的論述也是多見於詩學，其他如小說、戲曲等子類體則少見。本論文所重構的「詮釋模型」是理論性的通則或框架；而理論性的通則或框架必有其詮釋效力的「覆蓋率」；詮釋效力較高的「模型」應該能覆蓋最多子類體之詮釋。如何將我們所建構「正變文學史觀」的二種「詮釋模型」應用在各個子類體，例如小說、戲曲等，以詮釋其正變源流的發展，這是延伸性的問題，也是未來的展望，實有待學者撰寫「中國文學史」時，資藉應用，以驗證這二種「模型」的詮釋效力；假如能廣被

應用於多數的子類體，也就可以驗證其詮釋效力的「覆蓋率」；當能顯示「內造建構」的文學史觀，比諸挪借西方理論而「外造建構」的進化、唯物史觀，更能貼切於中國文學的起源、演化的軌則，而獲致相對有效性的詮釋。

【責任編校：黃璿璋、黃競緯】

## 徵引文獻

### 專著

- [春秋]左丘明 Zuo Qiuming 著，〔三國〕韋昭 Wei Zhao 注：《國語》*Guoyu*，臺北 Taipei：九思出版公司 Jiusi chuban gongsi，1978 年。
- [春秋]老子 Laozi 著，〔魏〕王弼 Wang Bi 注：《老子注》*Laozi zhu*，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72 年。
- [戰國]荀卿 Xun Qing 著，〔清〕王先謙 Wang Xianqian 集解：《荀子集解》*Xunzi jijie*，臺北 Taipei：世界書局 Shijie shuju，1971 年。
- [戰國]莊周 Zhuang Zhou 著，〔清〕郭慶藩 Guo Qingfan 集釋：《莊子集釋》*Zhuangzi jishi*，臺北 Taipei：河洛圖書 Heluo tushu，1974 年。
- [漢]毛亨 Mao Heng 傳，〔漢〕鄭玄 Zheng Xuan 箋，〔唐〕孔穎達 Kong Yingda 疏：《詩經注疏》*Shijing zhushu*，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73 年。
- [漢]王逸 Wang Yi 注，〔宋〕洪興祖 Hong Xingzu 補注：《楚辭補注》*Chuci buzhu*，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68 年。
- [漢]班固 Ban Gu 著，〔唐〕顏師古 Yan Shigu 注，〔清〕王先謙 Wang Xianqian 補注：《漢書補注》*Hanshu buzhu* 第 2 冊，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72 年。
- [漢]班固 Ban Gu 編，〔清〕陳立 Chen Li 疏證：《白虎通疏證》*Baihutong shuzheng* 上冊，臺北 Taipei：廣文書局 Guangwen shuju，1987 年。
- [漢]許慎 Xu Shen 著，〔清〕段玉裁 Duan Yucai 注：《說文解字注》*Shuowen jiezi zhu*，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66 年。
- [漢]司馬遷 Sima Qian：《史記》*Shiji* 第 2 冊，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55 年。
- [漢]鄭玄 Zheng Xuan 注，〔唐〕孔穎達 Kong Yingda 疏：《禮記注疏》*Liji zhushu*，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73 年。

- [魏]王弼 Wang Bi、[晉]韓康伯 Han Kangbo 注、[唐]孔穎達 Kong Yingda 疏：《周易注疏》*Zhouyi zhushu*，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73 年。
- [南朝宋]范曄 Fan Ye 著、[唐]李賢 Li Xian 注、[清]王先謙 Wang Xianqian 集解：《後漢書集解》*Houhanshu jijie* 第 1 冊，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82 年。
- [南朝梁]劉勰 Liu Xie 著，周振甫 Zhou Zhenfu 注釋：《文心雕龍注釋》*Wenxin diaolong zhushi*，臺北 Taipei：里仁書局 Liren shuju，1984 年。
- [南朝梁]蕭子顯 Xiao Zixian：《南齊書》*Nanqishu*，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55 年。
- [南朝梁]蕭統 Xiao Tong 編，李善 Li Shan 注：《文選》*Wenxuan*，臺北 Taipei：華正書局 Huazheng shuju，1982 年。
- [南朝梁]鍾嶸 Zhong Rong 著，曹旭 Cao Xu 箋注：《詩品箋注》*Shipin jianzhu*，北京 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2009 年。
- [唐]房玄齡 Fang Xuanling 等著，[清]吳士鑑 Wu Shijian、劉承幹 Liu Chenggan 輯注：《晉書輯注》*Jinshu jiaozhu* 第 2 冊，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1972 年。
- [宋]李昉 Li Fang 等編：《太平御覽》*Taiping yulan*，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92 年。
- [宋]嚴羽 Yan Yu 著，張健 Zhang Jian 校箋：《滄浪詩話校箋》*Canglang shihua jiaojian* 上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12 年。
- [宋]蘇軾 Su Shi：《蘇東坡全集》*Su Dongpo quanji*，臺北 Taipei：河洛圖書 Heluo tushu，1975 年。
- [元]方回 Fang Hui 選評，李慶甲 Li Qingjia 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Yingkui lüsuì huiping* 中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5 年。
- [元]楊士弘 Yang Shihong：《唐音》*Tangyin*，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82 年。
- [明]吳訥 Wu Ne 著，于北山 Yu Beishan 校點：《文章辨體序說》*Wenzhang bianti xushuo*，香港 Hong Kong：太平書局 Taiping shuju，1977 年。

- [明]徐師曾 Xu Shizeng:《文體明辨》*Wenti mingbian* 第1冊,京都 Kyōto: 中文出版社 Chūbun shuppansha, 1988年。
- [明]高棅 Gao Bing:《唐詩品彙》*Tangshi pinhui*,臺北 Taipei: 學海出版社 Xuehai chubanshe, 1983年。
- [明]許學夷 Xu Xueyi 著,杜維沫 Du Weimo 校點:《詩源辯體》*Shiyuan bianti*,北京 Beijing: 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zue chubanshe, 1998年。
- [明]顧炎武 Gu Yanwu:《原抄本日知錄》*Yuanchaoben rizhilu*,臺南 Tainan: 唯一書業中心 Weiyi shuye zhongxin, 1975年。
- [清]汪琬 Wang Wan 著,李聖華 Li Shenghua 箋校:《汪琬全集箋校》*Wang Wan quanji jianjiao*,北京 Beijing: 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zue chubanshe, 2010年。
- [清]沈德潛 Shen Deqian:《古詩源》*Gushiyuan*,臺北 Taipei: 臺灣中華書局 Taiwan zhonghua shuju, 1987年。
- [清]姚鼐 Yao Nai 編,王文濡 Wang Wenru 校注:《古文辭類纂評注》*Guwen cileizuan pingzhu* 第1冊,臺北 Taipei: 臺灣中華書局 Taiwan zhonghua shuju, 1969年。
- [清]張惠言 Zhang Huiyan、董毅 Dong Yi 編,李次九 Li Cijiu 校讀:《詞選續詞選校讀》*Cixuan xucixuan jiaodu* 上冊,臺北 Taipei: 復興書局 Fuxing shuju, 1971年。
- [清]陳廷焯 Chen Tingzhao 著,屈興國 Qu Xingguo 校注:《白雨齋詞話足本校注》*Baiyuzhai cihua zuben jiaozhu* 上、下冊,濟南 Jinan: 齊魯書社 Qilu shushe, 1983年。
- [清]黃生 Huang Sheng:《杜工部詩說》*Dugongbu shishuo*,京都 Kyōto: 中文出版社 Chūbun shuppansha, 1976年。
- [清]葉燮 Ye Xie 著,霍松林 Huo Songlin 校注:《原詩》*Yuanshi*,北京 Beijing: 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zue chubanshe, 1979年。
- [清]嚴可均 Yan Kejun 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Quanshanggu sandai qinhan sanguo liuchaowen*,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91年。
- [清]竇警凡 Dou Jingfan:《歷朝文學史》*Lichao wenzueshi*,線裝鉛印本, 1906年。

-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wenxue yanjiusuo 總纂，北京大學 Beijing daxue、南京師範大學 Nanjing shifan daxue 協作編纂：《中國文學通史》 *Zhongguo wenxue tongshi*，北京 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1991 年。
-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編寫組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wenxue yanjiusuo zhongguo wenxueshi bianxiezu 編：《中國文學史》 *Zhongguo wenxueshi*，北京 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1962 年。
- 王文仁 Wang Wenren：《啟蒙與迷魅——近現代視野下的中國文學進化史觀》 *Qimeng yu mimei: jinxiandai shiye xia de zhongguo wenxue jinhua shiguan*，臺北 Taipei：博揚文化 Boyang wenhua，2011 年。
- 王文生 Wang Wensheng 主編：《中國文學史》 *Zhongguo wenxueshi*，北京 Beijing：高等教育出版社 Gaodeng jiaoyu chubanshe，1989 年。
- 王忠林 Wang Zhonglin 等合著：《增訂中國文學史初稿》 *Zengding zhongguo wenxueshi chugao*，臺北 Taipei：福記文化 Fuji wenhua，1985 年。
- 王易 Wang Yi：《詞曲史》 *Ciqushi*，上海 Shanghai：神州國光社 Shenzhou guoguangshe，1931 年；臺北 Taipei：廣文書局 Guangwen shuju，1960 年。
- 王國維 Wang Guowei：《宋元戲曲史》 *Songyuan xiqushi*，上海 Shanghai：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1915 年；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64 年。
- 王夢曾 Wang Mengzeng：《中國文學史》 *Zhongguo wenxueshi*，上海 Shanghai：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1914 年。
- 王鍾陵 Wang Zhongling：《文學史新方法論》 *Wenxueshi xinfangfalun*，臺北 Taipei：文史哲出版社 Wenshizhe chubanshe，2003 年。
- 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門化 1955 級集體 Beijing daxue zhongwenxi wenxue zhuanmenhua 1955 ji jiti 編：《中國文學史》 *Zhongguo wenxueshi*，北京 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1958、1959 年；高雄 Kaohsiung：復文圖書出版社 Fuwen tushu chubanshe，1983 年。
- 吉平平 Ji Pingping、黃曉靜 Huang Xiaojing 合編：《中國文學史著版本概覽》 *Zhongguo wenxue shizhu banben gailan*，瀋陽 Shenyang：遼寧大學出版社 Liaoning daxue chubanshe，1996 年。

- 吉林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學史教材編寫小組 Jilin daxue zhongwenxi zhongguo wenxueshi jiaocai bianxie xiaozu 編：《中國文學史》*Zhongguo wenxueshi*，長春 Changchun：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renmin chubanshe，1959-1961 年。
- 朱自清 Zhu Ziqing：《詩言志辨》*Shiyanzhi bian*，臺北 Taipei：頂淵文化 Dingyuan wenhua，2001 年。
- 朱希祖 Zhu Xizu：《中國文學史要略》*Zhongguo wenxueshi yaolie*，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部 Beijing daxue chubanshe，1916 年。
- 李曰剛 Li Yuegang：《中國文學流變史（三）——詩歌編》*Zhongguo wenxue liubianshi (3): shigebian*，臺北 Taipei：聯貫出版社 Lianguan chubanshe，1976 年。
- ：《中國詩歌流變史》*Zhongguo shige liubianshi*，臺北 Taipei：文津出版社 Wenjin chubanshe，1987 年。
- ：《中國辭賦流變史》*Zhongguo cifu liubianshi*，臺北 Taipei：文津出版社 Wenjin chubanshe，1987 年。
- 李悔吾 Li Huiwu：《中國小說史漫稿》*Zhongguo xiaoshuoshi mangao*，武漢 Wuhan：湖北教育出版社 Hubei jiaoyu chubanshe，1992 年。
- ：《中國小說史》*Zhongguo xiaoshuoshi*，臺北 Taipei：洪葉文化 Hongye wenhua，1995 年。
- 李劍國 Li Jianguo：《唐前志怪小說史》*Tangqian zhiguai xiaoshuoshi*，天津 Tianjin：南開大學出版社 Nankai daxue chubanshe，1984 年。
- 周貽白 Zhou Yibai：《中國戲劇史》*Zhongguo xijus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40 年。
- 孟瑤 Meng Yao：《中國戲曲史》*Zhongguo xiquoshi*，臺北 Taipei：傳記文學出版社 Zhuanji wenxue chubanshe，1960 年。
- ：《中國小說史》*Zhongguo xiaoshuoshi*，臺北 Taipei：文星書店 Wenxing shudian，1966 年。
- 林庚 Lin Geng：《中國文學史》*Zhongguo wenxueshi*，廈門 Xiamen：廈門大學出版社 Xiamen daxue chubanshe，1947 年；臺北 Taipei：廣文書局 Guangwen shuju，1963 年。
- 林傳甲 Lin Chuanjia：《中國文學史》*Zhongguo wenxueshi*，杭州 Hangzhou：武林謀新室 Wulin mouxinshi，1910 年；臺北 Taipei：學海出版社 Xuehai chubanshe，1986 年。

- 林繼中 Lin Jizhong :《文學史新視野》*Wenxueshi xinshiye* , 北京 Beijing : 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 2000 年。
- 阿英 Aying :《晚清小說史》*Wanqing xiaoshuoshi* , 上海 Shanghai : 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 , 1937 年 ; 臺北 Taipei : 天宇出版社 Tianyu chubanshe , 1988 年。
- 柳存仁 Liu Cunren :《中國文學史》*Zhongguo wenxueshi* , 香港 Hong Kong : 大公書局 Dagong shuju , 1956 年 ; 臺北 Taipei : 臺灣東方書店 Taiwan dongfang shudian , 1958 年 ; 臺北 Taipei : 莊嚴出版社 Zhuangyan chubanshe , 1979 年。
- 胡小石 Hu Xiaoshi :《中國文學史》*Zhongguo wenxueshi* , 上海 Shanghai : 人文社 Renwenshe , 1930 年。
- 胡雲翼 Hu Yunyi :《增訂本中國文學史》*Zengdingben zhongguo wenxueshi* , 上海 Shanghai : 教育書店 Jiaoyu shudian , 1931 年 ; 臺北 Taipei : 第一文化社 Diyi wenhuashe , 1956 年 ; 臺北 Taipei : 三民書局 Sanmin shuju , 1979 年。
- 胡毓寰 Hu Yuhuan :《中國文學源流》*Zhongguo wenxue yuanliu* , 上海 Shanghai : 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 , 1924 年 ; 臺北 Taipei : 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 1966 年。
- 胡適 Hu Shi :《白話文學史(上)》*Baihua wenxueshi (shang)* , 上海 Shanghai : 新月書店 Xinyue shudian , 1928 年 ; 臺北 Taipei : 啟明書局 Qiming shuju , 1957 年。
- 胡適 Hu Shi 著 , 歐陽哲生 Ouyang Zhesheng 編 :《胡適文集》*Hu Shi wenji* 第 1、2、8 冊 , 北京 Beijing : 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 1998 年。
- 胡懷琛 Hu Huaichen :《中國文學史略》*Zhongguo wenxue shilie* , 上海 Shanghai : 梁溪圖書館 Liangxi tushuguan , 1924 年 ; 臺北 Taipei : 廣文書局 Guangwen shuju , 1980 年。
- 袁珂 Yuan Ke :《中國神話史》*Zhongguo shenhuashi* , 上海 Shanghai : 上海文藝出版社 Shanghai wenyi chubanshe , 1987 年 ; 臺北 Taipei : 時報文化 Shibao wenhua , 1991 年。

馬積高 Ma Jigao、黃鈞 Huang Jun 主編：《中國古代文學史》*Zhongguo gudai wenxueshi*，長沙 Changsha：湖南文藝出版社 Hunan wenyi chubanshe，1992年；臺北 Taipei：五南圖書 Wunan tushu，1990年。

馬積高 Ma Jigao：《賦史》*Fush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7年。

張之純 Zhang Zhichun：《中國文學史》*Zhongguo wenxueshi*，上海 Shanghai：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1915年。

梁乙真 Liang Yizhen：《清代婦女文學史》*Qingdai funü wenxueshi*，上海 Shanghai：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27年；臺北 Taipei：臺灣中華書局 Taiwan zhonghua shuju，1958年。

——：《中國婦女文學史綱》*Zhongguo funü wenxue shigang*，上海 Shanghai：開明書店 Kaiming shudian，1932年。

許總 Xu Zong：《唐詩史》*Tangshishi*，南京 Nanjing：江蘇教育出版社 Jiangsu jiaoyu chubanshe，1994年。

郭紹虞 Guo Shaoyu：《中國文學批評史》*Zhongguo wenxue pipingshi* 上卷，臺北 Taipei：文史哲出版社 Wenshizhe chubanshe，1979年。

陳平原 Chen Pingyuan：《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Wenxueshi de xingcheng yu jiangou*，桂林 Guilin：廣西教育出版社 Guangxi jiaoyu chubanshe，1999年。

陳玉堂 Chen Yutang：《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Zhongguo wenxueshi shumu tiyao*，合肥 Hefei：黃山書社 Huangshan shushe，1986年。

陳伯海 Chen Bohai：《中國文學史之宏觀》*Zhongguo wenxueshi zhi hongguan*，北京 Beijing：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1995年。

陳柱 Chen Zhu：《中國散文史》*Zhongguo sanwenshi*，上海 Shanghai：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1937年；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65年。

陳國球 Chen Guoqi：《胡應麟詩論研究》*Hu Yinglin shilun yanjiu*，香港 Hong Kong：華風書局 Huafeng shuju，1986年。

——：《文學史的書寫型態與文化政治》*Wenxueshi de shuxie xingtai yu wenhua zhengzhi*，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2004年。

- 陶東風 Tao Dongfeng :《文學史哲學》*Wenxueshi zhexue* , 鄭州 Zhengzhou : 河南人民出版社 Henan renmin chubanshe , 1994 年。
- 陸侃如 Lu Kanru、馮沅君 Feng Yuanjun :《中國詩史》*Zhongguo shishi* , 上海 Shanghai : 大江書鋪 Dajiang shupu , 1931 年 ; 臺北 Taipei : 明倫出版社 Minglun chubanshe , 1969 年。
- :《中國文學史簡編》*Zhongguo wenxueshi jianbian* , 上海 Shanghai : 大江書鋪 Dajiang shupu , 1932 年 ; 臺北 Taipei : 開明書店 Kaiming shudian , 1957 年。
- 傅斯年 Fu Sinian 著 , 陳槃 Chen Pan 等校訂 :《傅斯年全集》*Fu Sinian quanji* 第 1 冊 , 臺北 Taipei :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Lianjing chuban shiye gongsi , 1980 年。
- 傅斯年 Fu Sinian 著 , 傅孟真先生遺著編輯委員會 Fu Mengzhen xiansheng yizhu bianji weiyuanhui 編 :《傅孟真先生集》*Fu Mengzhen xiansheng ji* 第 2 冊中編上 , 臺北 Taipei : 國立臺灣大學 Guoli taiwan daxue , 1952 年。
- 復旦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組學生集體 Fudan daxue zhongwenxi gudian wenxuezu xuesheng jiti 編 :《中國文學史》*Zhongguo wenxueshi* , 北京 Beijing :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 1958-1959 年。
- 曾毅 Zeng Yi :《中國文學史》*Zhongguo wenxueshi* , 上海 Shanghai : 泰東圖書局 Taidong tushuju , 1915 年 ; 臺北 Taipei : 文史哲出版社 Wenshizhe chubanshe , 1977 年。
- 游國恩 You Guoen 等主編 :《中國文學史》*Zhongguo wenxueshi* , 北京 Beijing : 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 , 1963-1964 年 ; 臺北 Taipei : 五南圖書 Wunan tushu , 1990 年。
- 程千帆 Cheng Qianfan、吳新雷 Wu Xinlei :《兩宋文學史》*Liangsong wenxueshi* , 上海 Shanghai : 上海古籍出版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 1991 年。
- 程章燦 Cheng Zhangcan :《魏晉南北朝賦史》*Weijin nanbeichao fushi* , 南京 Nanjing : 江蘇古籍出版社 Jiangsu guji chubanshe , 1990 年。
- 黃人 Huang Ren :《中國文學史》*Zhongguo wenxueshi* , 上海 Shanghai : 國學扶輪社 Guoxue fulunshe , 約 1905 年。
- 黃公偉 Huang Gongwei :《中國文學史》*Zhongguo wenxueshi* , 臺北 Taipei : 帕米爾書店 Pamier shudian , 1967 年。

- 黃文吉 Huang Wenji：《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Zhongguo wenxueshi shumutiyao*，臺北 Taipei：萬卷樓圖書 Wanjuanlou tushu，1996 年。
- 葉慶炳 Ye Qingbing：《中國文學史》*Zhongguo wenxueshi* 上、下冊，臺北 Taipei：作者自印 Zuozhe ziyin，1965、1966 年；臺北 Taipei：臺灣學生書局 Taiwan xuesheng shuju，1987 年。
- 董乃斌 Dong Naibin、陳伯海 Chen Bohai、劉揚忠 Liu Yangzhong 主編：《中國文學史學史》*Zhongguo wenxueshi xueshi* 第 1、2 卷，石家莊 Shijiazhuang：河北人民出版社 Hebei renmin chubanshe，2003 年。
- 褚斌杰 Chu Binjie、袁行霈 Yuan Xingpei、李修生 Li Xiusheng：《中國文學史綱要》*Zhongguo wenxueshi gangyao*，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1997 年。
- 趙景深 Zhao Jingshen：《中國文學史小史》*Zhongguo wenxueshi xiaoshi*，上海 Shanghai：光華書局 Guanghua shuju，1926 年；臺北 Taipei：啟明書局 Qiming shuju，1958 年。
- 劉大杰 Liu Dajie：《中國文學發展史》*Zhongguo wenxue fazhanshi* 上、下冊，上海 Shanghai：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41、1949 年。
- ：《中國文學發達史》*Zhongguo wenxue fadashi*，臺北 Taipei：臺灣中華書局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56 年。
- 劉師培 Liu Shiwei：《中古文學史》*Zhonggu wenxueshi*，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部 Beijing daxue chubanshe，1920 年；臺北 Taipei：文海出版社 Wenhai chubanshe，1972 年。
- 劉麟生 Liu Linsheng：《中國文學史》*Zhongguo wenxueshi*，上海 Shanghai：世界書局 Shijie shuju，1932 年；臺北 Taipei：中新書局 Zhongxin shuju，1977 年。
- ：《中國駢文史》*Zhongguo pianwenshi*，上海 Shanghai：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1936 年；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65 年。
- 鄭振鐸 Zheng Zhenduo：《插圖本中國文學史》*Chatuben zhongguo wenxueshi*，北京 Beijing：樸社 Pushe，1932 年。
- ：《中國俗文學史》*Zhongguo suwenxueshi*，上海 Shanghai：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1938 年；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65 年。

- 鄭振鐸 Zheng Zhenduo：《中國文學史》*Zhongguo wenxueshi*，臺北 Taipei：明倫出版社 Minglun chubanshe，1969 年。
- ：《中國文學研究》*Zhongguo wenxue yanjiu* 下冊，北京 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2000 年。
- 魯迅 Lu Xun：《中國小說史略》*Zhongguo xiaoshuo shilue* 上、下卷，北京 Beijing：新潮社 Xinchao she，1923、1924 年；臺北 Taipei：明倫出版社 Minglun chubanshe，1969 年。
- 魯迅 Lu Xun 著，吳俊 Wu Jun 編校：《魯迅學術論著》*Lu Xun xueshu lunzhu*，杭州 Hangzhou：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renmin chubanshe，1998 年。
- 盧冀野 Lu Jiye：《明清戲曲史》*Mingqing xiqushi*，南京 Nanjing：鍾山書局 Zhongshan shuju，1933 年；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71 年。
- 蕭滌非 Xiao Difei：《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Hanwei liuchao yuefu wenxueshi*，重慶 Chongqing：中國文化服務社 Zhongguo wenhua fuwushe，1944 年；臺北 Taipei：長安出版社 Changan chubanshe，1976 年。
- 錢鍾書 Qian Zhongshu：《談藝錄》*Tanyilu*，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2011 年。
- 龍沐勛 Long Muxun：《中國韻文史》*Zhongguo yunwenshi*，上海 Shanghai：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1934 年；臺北 Taipei：樂天出版社 Letian chubanshe，1970 年。
- 戴燕 Dai Yan：《文學史的權力》*Wenxueshi de quanli*，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2002 年。
- 謝无量 Xie Wuliang：《中國婦女文學史》*Zhongguo funü wenxueshi*，上海 Shanghai：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16 年；臺北 Taipei：臺灣中華書局 Taiwan zhonghua shuju，1973 年。
- ：《中國大文學史》*Zhongguo dawenxueshi*，上海 Shanghai：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18 年；臺北 Taipei：臺灣中華書局 Taiwan zhonghua shuju，1967 年。
- 顏崑陽 Yan Kunyang：《詮釋的多向視域——中國古典美學與文學批評系論》*Quanshi de duoxiang shiyu: zhongguo gudian meixue yu wenxue piping xilun*，臺北 Taipei：臺灣學生書局 Taiwan xuesheng shuju，2016 年。

- 羅根澤 Luo Genze：《樂府文學史》*Yuefu wenxueshi*，北京 Beijing：文化學社 Wenhua xueshe，1931 年；臺北 Taipei：文史哲出版社 Wenshizhe chubanshe，1991 年。
- 羅錦堂 Luo Jintang：《中國散曲史》*Zhongguo sanqushi*，臺北 Taipei：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Zhonghua wenhua chuban shiye weiyuanhui，1956 年。
- 譚正璧 Tan Zhengbi：《中國文學進化史》*Zhongguo wenxue jinhuashi*，上海 Shanghai：光明書局 Guangming shuju，1929 年。
- 嚴建強 Yan Jianqiang、王淵明 Wang Yuanming：《西方歷史哲學》*Xifang lishi zhexue*，臺北 Taipei：慧明文化 Huiming wenhua，2001 年。
- 嚴迪昌 Yan Dichang：《清詞史》*Qingcishi*，南京 Nanjing：江蘇古籍出版社 Jiangsu guji chubanshe，1990 年。
- 嚴復 Yan Fu 著，王棊 Wang Shi 主編：《嚴復集》*Yan Fuji* 第 1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6 年。
- 龔鵬程 Gong Pengcheng：《中國文學史》*Zhongguo wenxueshi* 上、下冊，臺北 Taipei：里仁書局 Liren shuju，2009、2010 年。
- [英]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著，嚴復 Yan Fu 譯：《群學肄言》*Qunxue yiyán (The Study of Sociology)*，上海 Shanghai：文明書局 Wenming shuju，1903 年；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zhonghua shuju，1970 年。
- [英]赫胥黎 Thomas Henry Huxley 著，嚴復 Yan Fu 譯：《天演論》*Tiyanlun (Evolution and Ethics)*，湖北沔陽盧氏慎始齋木刻本，1898 年；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zhonghua shuju，1965 年。
- [義]維科 Giambattista Vico 著，朱光潛 Zhu Guangqian 譯：《新科學》*Xin kexue (Scienza Nuova)*，臺北 Taipei：駱駝出版社 Luotuo chubanshe，1987 年。
- [德]史賓格勒 Oswald Spengler 著，陳曉林 Chen Xiaolin 譯：《西方的沒落》*Xifang de moluo (The Decline of the West)*，臺北 Taipei：遠流出版公司 Yuanliu chuban gongsi，1986 年。
- [德]漢斯－格奧爾格·加達默爾 Hans-Georg Gadamer 著，洪漢鼎 Hong Handing 譯：《詮釋學 I：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Quanshixue I: zhenli yu fangfa: zhexue quanshixue de jiben tezhen (Hermeneutik I: Wahrheit und Methode: 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臺北 Taipei：時報文化 Shibao wenhua，1993 年。

期刊與專書論文

王齊洲 Wang Qizhou :〈「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文學史觀的現代意義〉“Yidai you yidai zhi wenxue’ wenxue shiguan de xiandai yiyi”,《文藝研究》*Wenyi yanjiu* 2002 年第 6 期。

周勛初 Zhou Xunchu :〈文學「一代有一代之所勝」說的重要歷史意義〉“Wenxue ‘yidai you yidai zhi suo sheng’ shuo de zhongyao lishi yiyi”,《文學遺產》*Wenxue yichan* 2000 年第 1 期。

齊森華 Qi Senhua、劉召明 Liu Zhaoming、余意 Yu Yi :〈「一代有一代之文學」論獻疑〉“Yidai you yidai zhi wenxue’ lun xianyi”,《文藝理論研究》*Wenyi lilun yanjiu* 2004 年第 5 期。

鄭振鐸 Zheng Zhenduo :〈整理中國文學的提議〉“Zhengli zhongguo wenxue de tiyi”,《文學旬刊》*Wenxue xunkan* 第 51 期, 1922 年 10 月。

顏崑陽 Yan Kunyang :〈論「文體」與「文類」的涵義及其關係〉“Lun ‘wenti’ yu ‘wenlei’ de hanyi ji qi guanxi”,《清華中文學報》*Qinghua zhongwen xuebao* 第 1 期, 2007 年 9 月。

——:〈混融、交涉、衍變到別用、分流、佈體——「抒情文學史」的反思與「完境文學史」的構想〉“Hunrong, jiaoshe, yanbian dao bieyong, fenliu, buti: ‘shuqing wenxueshi’ de fansi yu ‘wanjing wenxueshi’ de gouxiang”,《清華中文學報》*Qinghua zhongwen xuebao* 第 3 期, 2009 年 12 月。

——:〈中國古代原生性「源流文學史觀」詮釋模型之重構初論〉“Zhongguo gudai yuanshengxing ‘yuanliu wenxue shiguan’ quanshi moxing zhi chonggou chulun”,《政大中文學報》*Zhengda zhongwen xuebao* 第 15 期, 2011 年 6 月。

龔鵬程 Gong Pengcheng :〈試論文學史之研究——以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為例〉“Shilun wenxueshi zhi yanjiu: yi Liu Dajie ‘zhongguo wenxue fazhanshi’ wei li”, 收入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 *Zhongguo gudian wenxue yanjiuhui* 編:《古典文學》*Gudian wenxue* 第 5 集, 臺北 Taipei: 臺灣學生書局 Taiwan xuesheng shuju, 1983 年。

學位論文

王文仁 Wang Wenren :《近現代中國文學進化史觀之生成與影響》*Jinxiandai zhongguo wenxue jinhua shiguan zhi shengcheng yu yingxiang*, 花蓮 Hualien :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論文 *Guoli donghua daxue zhongguo yuwen xuexi boshi lunwen*，2007 年。

崔文娟 Cui Wenjuan：《中國詩學「正變」觀念析論》*Zhongguo shixue "zhengbian" guannian xilun*，高雄 Kaohsiung：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Guoli gaoxiong shifan daxue guowen xuexi yanjiusuo shuoshi lunwen*，1990 年。

謝明陽 Xie Mingyang：《許學夷《詩源辯體》研究》*Xu Xueyi Shiyuan bianti yanjiu*，臺北 Taipei：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Guoli zhengzhi daxue zhongguo wenxuexi shuoshi lunwen*，1996 年。